

記憶

REMEMBRANCE



头戴钢盔,手握长枪,武装起来的造反派,在街头来去匆匆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9年7月15日第15期 总第259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59期

地方文革研究专辑（9）

【专稿】

云南文革史稿（卷二）

军管时代：狂奔的仇恨与错位的篱笆

（1967.1.8——1968.8.13）

第一章 大洗牌

- 一、乱哄哄的开台锣鼓
- 二、用枪杆子扎紧篱笆
- 三、老干部的焦虑和迷惘
- 四、赵建民找“婆家”

第二章 从426到528

- 五、“426事件”：云南首开先河的大武斗
- 六、力量重组·角色转换·舆论战
- 七、528、529——又一个夸大其词的“惨案”

第三章 钦差大臣失败的昆明之行

- 八、1967年的夏季形势
- 九、钦差大臣到昆明
- 十、《八八批示》
- 十一、“八四大会”和“摧资兵团”
- 十二、力量的重组和转移

【本刊声明】

【专稿】

云南文革史稿（卷二）

军管时代：狂奔的仇恨与错位的篱笆

（1967.1.8——1968.8.13）

周孜仁

第一章 大洗牌

一、乱哄哄的开台锣鼓

批判资反路线运动在全国推进，到1967开年，造反派已成高歌猛进、摧枯拉朽之势，官僚集团已然七零八落，保守派溃不成军。张春桥策划的上海夺权成功，使毛泽东策动的“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¹正式擂响开台锣鼓。1月22日，党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格调、语式与红卫兵小报如出一辙，杀气腾腾，通篇皆见惊叹号。摘要如下：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最盛大的节日到来了，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敲响了！让我们高举双手，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飞跃。这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

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其伟大的创举，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事，是关系到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大事。

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

¹ 见《人民日报》1967年元旦社论。

夺权！！夺权！！！！

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胜利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历史任务。

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笔者其时还在重庆参加运动并主编重庆大学815战斗团的《815战报》，当夜听此广播，继而急匆匆写稿、编稿、跑印刷厂再赴街头欢呼通宵达旦，疯魔狂躁之状至今记忆犹新。昆明造反派的情况想必亦如此。正如一年前当权派跟北京狂批三家村。这回轮到造反派来依样画葫芦。

1月16日，“云南日报革命造反委员会”“昆明市邮电工人战斗总队”“昆明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联合行动，接管了《云南日报》，发出1月16日《通令》，宣布报社一切权力归《云南日报》“革命造反委员会”；报社职工从即日起，一律按“革命造反委员会”的安排上班。这是云南省被夺权的第一个省级单位，随后，云南人民广播电台、省委宣传部、云南人民出版社亦相继夺权——夺权之风很快遍及全省各地。1月27日，昆明近郊的呈贡县造反派夺取了全县党、政、财、文领导权，成为云南省造反派夺权的第一个县，2月1日，《云南日报》报道“呈贡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发出的夺权“通令”，并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文欢呼《让革命农民运动的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称呈贡造反派的夺权活动，为全省“树立了活的榜样”。各级公、检、法机关内部的造反组织，在社会上的两派造反组织的支持下，也先后起来夺权。

华彩段当然是夺省委和市委的权。事情发生在1月26日。次日《云南日报》对此头版通栏做了报道：

眉题：昆明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十万多人举行声势浩大的夺权誓师大会

正题：革命造反派大联合 大团结 大夺权

副题：解放军代表表示：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誓作革命造反派的坚强后盾。

对于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必须进行坚决镇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敌人不投降，就叫它彻底灭亡

通讯写道：“在全国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团结大夺权的大好形势下，昆明十万多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昨天（一月二十六日）晚上举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夺权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的革命工人、革命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怀着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心情，向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保证：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紧把握住斗争的大方向，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把一切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消息还称：“从郊区六甲、金马，福海等公社赶来参加大会的革命造反派农民，高呼着‘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万岁！’‘打倒分裂主义’等口号，和革命造反派工人，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人民解放军驻昆部队，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昨晚，警卫着大会会场，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誓作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坚强后盾，誓作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流砥柱，把无产阶级必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边地关河阻隔。昆明的文革运动本比内地慢半拍，专县的文革再慢半拍，夺权乱象就更是五花八门。著名锡都个旧是云南当时仅有四个地级市之一¹，造反派刚起事尚不足两月，听中央喊夺权了，也跟着一哄而起。当地名气最大、兵强马壮的造反派组织叫“个旧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成员均为官方指定开展文革的单位造反派，全国批资反动路线，他们遂以批工作组、追黑材料、为打成四类反革命份子平反之名起事，人数已达数万。省城夺权次日：1月28日，便有当地一个“小不点儿”急不可耐地找上门来，动员联司一号“勤务员”张振钧动手。

张振钧，1962年毕业于昆明工业学校，先在部队服役一年即转红河州水利工作队搞技

¹ 其他3个分别是昆明市、下关市（今大理市）和东川市（今昆明市东川区）。

术工作，算得机关干部，社会经验相对丰富，谋事老道，他认为造反派毫无行政经验，印把子接过来反成累赘，要夺最多把广播站、银行夺过来就完了。游说张司令的“小不点儿”是一个“临时工、合同工”组织，成员多运输队、蔬菜站、地质队的年轻“贱民”，“出身”不好或亲戚朋友多有“政治问题”“历史问题”的社会失意者，读书无望，就来当了临时工、合同工，社会底层最渴望改变命运者。他们的组织成立于前一个月，全名“个旧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筹备处”，简称“筹备处”，人数不多但能量最大，他们一心想联合“联司”把权夺过来。尽管“张司令”态度模糊，他们还是在来此串联的云南大学《打活老虎炮兵团》、清华《同心干》、北大《长征队》等学生支持下，断然组织人马冲进州政府机关，从一楼到四楼，将所有屋子封条封了：包括厕所——可是，等到将一大堆红通通大印夺过手，临时工们发愁了。筹备处“司令”朱醒民立即向当地驻军和公安局报告，说“现在夺权已经结束了，请解放军和公安局代为保管印鉴。”孰料解放军首长和公安局负责人一句话顶回，说夺权是革命群众自己的事情，还是你们自己保管吧！为防意外，筹备处只得选派了十来个人代表将一堆红印章看守了一夜。

意外恰恰在这一夜发生了。以机关干部为主的保守派组织《铁扫帚》《红河风暴》《红旗》等，星夜派州委办公室代主任余秉堂等5人驱车数十里外的开远县十三军驻地向军人告状，说牛鬼蛇神反了。四清时期，十三军派员到个旧参加工作组，对该市人事情况多有了解。最糟糕的偏偏是：联络站一把手朱醒民，乃父正是国民党建水县“伪县长”，本人就是长期被监控的主儿，军长吴效闵听说“牛鬼蛇神翻天”了，马上一拍桌子表态，急呼镇压。有军人撑腰，州公安局当晚夜里便将朱醒民一干人等抓了，五花大绑，跪地批斗，接下来用现成档案向社会揭“筹备处”头头老底：朱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刘某“思想意识不好，品质恶劣，乱搞男女关系”；斯某“伪造购烟证、饭卡”“调戏女学生”；熊某“五七年有右派言论”“本人已婚并有两个小孩，扬言‘没有爱人’，以达到勾引玩弄妇女的目的”……等等。南下学生则统统宣布为“反革命政变黑后台”围攻并驱逐之。再接下来，保守派也成立组织，起名223，说明造反时间为2月23日，同时正好与昆明的823

配套，也应当属于造反派，于是再次神气起来。于是，一场围绕“128行动”到底是“真夺权”还是“假夺权”？“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大方向始终正确”“为锡城文化大革命写下光辉一页”还是“牛鬼蛇神翻天”？一场混战顿时烽烟四起，大字报、标语、歌曲铺天盖地……哀牢山群峰四围这座遥远旧城，从此再无宁日。¹

如果说个旧多少算得是工业化城市，社会表象与昆明尚有些许相似，更偏远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则因夺权刺激而起的革命歇斯底里和造反乱象，就更加血腥残忍和无厘头。十七年来为稳定边疆而全部列入统战对象的少数民族土司、山官、头人，无一例外地被揪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在夺权乱局中残酷打击的各族干部，被揪斗、游街、罚跪、关牛棚的县团级人士158人。1967年1月20日，德宏州副州长雷春国刚从潞西社教工作团回州政府，即被揪到会场接受批判，造反派给他戴上“反革命”的高帽子，逼他交出“国民党的委任状”，将他打为“混入共产党搞复辟倒退的特务”，抄家、游街、批斗无所不用其极。雷春国，景颇族名穆日·道光早东，陇川县王子树村山官。1950年，解放军进驻陇川，雷春国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宣布放弃山官特权，将联防队改为民兵队，并拿出家中武器协助解放军剿匪。1952年春被选为第一届全国青联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到北京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1956年4月，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改自治州，雷春国担任副州长。1959年加入中共。1960年，他参加中缅联合勘界，担任片(马)古(浪)岗(房)管理委员会副主任。1961年随同周恩来访问缅甸。雷春国曾被选为国家民委委员、全国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夺权狂潮之中，雷不堪忍受侮辱，带领全家四人一起服毒自杀。遗书载明，将存款中158元作为安葬费，其余4860元作为最后一笔党费交给中共党组织²。作为本故事注释，可以补充一提的是：1967年2月26日，陈伯达、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云南群众代表，有人一本正经请示：民主党派的权夺不夺？“康生笑了笑说：民主党派的权夺他干什么！还想

¹ 本节表述摘要自“1967年6月1日“新红河无产阶级革命派司令部宣传组”编印的《128和锡城的文化大革命》，并经由张振钧先生进行补充和核实。

² 参见云南人民出版社：《陇川县志，人物篇》

当资产阶级？当国民党？”¹

继续回过头来看省会昆明。1月27日的《云南日报》大夺权的消息后面，模仿上海格式，发表了一则《紧急呼吁书》，呼吁书凡八条：

一、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只许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不许保守派冒充革命造反派‘夺权’，更不允许一小撮地、富、度、坏、右，牛鬼蛇神趁此机会钻入革命队伍，招摇撞骗，夺无产阶级的权，必须把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从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队伍中清除出去。

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与保守派互相勾通，搞假“夺权”。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切已被保守派“夺”过去的权，必须由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重新夺回来！坚决夺回来！

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就是要实行“独裁”。夺取政权后，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实行专政，谁敢反抗，就坚决镇压。

四、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夺取政权后，一切革命群众必须坚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任何人不得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对抗，挑动工人离开生产岗位，破坏革命，破坏生产。谁这样做就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处。

五、全市、全省党政领导机关中，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把持的一切领导权，必须要由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来夺取，任何单独的和小组的夺权行动都是不符合广大革命人民利益的，都是违反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的，都是搞分裂的行动，我们坚决反对。

六、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政权后，决不许保守派和其他任何人搞反夺权。谁敢组织反夺权就以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现行反革命论处。

¹ 1967年2月26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接见云南赴京代表时的讲话。《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七、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夺取政权后，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坚决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正确方针，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倒、斗垮、斗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组织人力，搞好生产，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大发展。

八、在夺权斗争中，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以任何借口，把斗争锋芒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

签字以昆明“八·二三”战斗兵团领衔，计有省委机关革命造反司令部、《云南日报》毛泽东思想《全无敌》战斗团、云南省荣誉军人休养院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昆明机床厂11·8战斗团、省建总公司12·6战斗兵团、云南汽车修配厂毛泽东思想1130战斗团、300信箱造反指挥部、200信箱“1·21战斗团”、大联合指挥部官渡区分郡、昆明农林学院“八·二三”革命造反战斗团及清华大学八·八战斗队、新北大《长征》战斗队等共30个单位。下面是一大堆口号。其中，最后两句最抢眼：“打倒分裂主义！”和“打倒宗派主义！”

云南日报宣传这个“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确实是在已成气候的823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主持下进行的。1月26日大会召开当日，“大联委”即已派人到省委和昆明市委机关夺了权。同日，炮派雏形“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联络站”破壳出世刚满4天，羽毛未丰而满身造反基因，焉能面对权力蛋糕无动于衷？1月26日上午，“新云南”及其所属造反组织甚至抢先出动，派人直奔五华山单方面夺了省人委及其所属厅、局的权；接着又派一部分人赶来云南省委和昆明市委机关——谁知省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多为八二三，以反对单方面夺权为由据理阻隔，等“大联合指挥部”人马赶到，这才里应外合，让八二三顺利夺走省委大印，夜八时，检阅台的大会胜利结束，十多万人再次列队游行到省委机关，宣布自己的胜利。

面对八二三这个以势压人的“大块头”，小不点儿“新云南”只能暂认力怯，从而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准备一朝复仇。云南两大派群众的血腥厮杀，暂时延期了。

二、用枪杆子扎紧篱笆

发生在全国各地这些乱哄哄的夺权，当然都是不可能得到北京承认的草台班。由蒯大富之流无法无天的毛头小子坐江山，毛泽东当然还不放心。夺权锋起，各地行政机构事实上已经瘫痪，为了让局面不至于完全失控，毛泽东不得不祭起共产党政权的护法神器：军队。用枪杆子扎起篱笆，将大闹天宫的乱民圈禁在自己的手掌心起舞。人民日报社论发出夺权号召前一天，1月21日，毛泽东即在南京军区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林彪同志：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是有真正革命派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夺权社论发布第二天，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出了“中发[67]27号文”：《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文件指出：“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文件规定：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革的指示一律作废；二，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要求军队援助他们，军队应当派出部队去支持他们；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四，重申不当保护“走资派”和保护“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防空洞”；五，全军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教育，进行对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这一指示传达到解放军每一个战士。一个多月后，3月19日又下发《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三支两军”成了军队的一项重要任务，据统计，从1967年2月开始，到1969年底，解放军先后派出280万指战员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毛泽东显然是要让军队为各地造反派的夺权行为护驾并加以监

管，建立预想的“文革新秩序”。¹

事实与毛的预设相反，此举非但未能让社会局面稳下来，反而愈益混乱。如果说红卫兵是毛打开的第一只“潘多拉魔盒”，那么完全可以说军队全面介入地方政事，成了毛打开的第二只失控“魔盒”。理由如次：

第一，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其界定本身就无明确的刚性标准，作为社会秩序的代表，军人对“社会成分复杂”、不安于现状的造反派、尤其因夺权分裂而出的激进造反派往往心存反感，一旦“支左”，他们大多向尚未垮台（或垮后东山再起）的保皇派，典型如四川“产业军”、武汉“百万雄师”等直接倾斜；或者向夺权中业已分裂出来的“稳健”造反派选边站²，云南属于后一种情况³，这必然使本已尖锐对立的社会矛盾迅速推向巅峰；

第二，军队绝非桃花源中人。他们始终与社会保持有千丝万缕联系，这种联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军队长期驻扎地方，于当地结婚生子的军官大有人在。驻军军官家属多无业务专长，一般都安排小企业、学校当个支部书记或其他闲职，却最喜欢管人训人，文革一来自然成了被冲击的“走资派”；二是共产党的地方官多亦由部队转下来，文革前全国学习解放军，为加强地方政治工作，云南省委（其他省亦然）还专门要求军队支援一批干部⁴，这些人和现职军人关系素多密切——以上两点，都必然影响现职军人的“左派”认定充满情绪性和不确定性⁵；云南文革，军官亲属干政最著名者，莫过于昆明军区副司令陈康夫人郭青，其趾高气扬以至于连儒雅的周总理都看不下去了，怒斥：“要你来教训我（吗？）”，陈康叫你牵着鼻子走，我不能被你牵着鼻子走”⁶；同样，以支持八派著称的14军军长梁

¹ 杨继绳《天地翻覆》第十三章

² 1967年8月4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部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这封信是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扩大会上，江青曾拿出来传阅，见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王力反思录》第2版（下），第256页。

³ 此专指昆明军区的主要领导和13、14两个野战军。地方军区则不同。地方分区除保山、昭通、楚雄、丽江、临沧外，全部支持保守派。

⁴ 文革前从部队下云南地方担任厅级领导，如张克（公交政治部主任）李体润（公交政治部主任）后来成为群众组织八派的铁杆骨干。

⁵ 这种联系除了与当地人结婚生子，建立了亲属网络，战友退伍或转业当地，都将其与地方社会构成千丝万缕的社会网络。

⁶ 1967年12月27日“周总理、康老、谢副总理接见昆明部队赴京开会全体同志的讲话”（《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

中玉，其夫人王某，正是大理一中教师、八派的铁杆干将；

第三，民主国家的军队属于国防军（内部安全则属警察职责），中共的天下是靠武力打下来，维持也必靠武力，军队在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方面就具有了全方位的权威地位，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诚乎此谓也。还有，文革前“全国学习解放军”，军队还得一称谓：“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该“校”推出的系列典型，以雷锋领衔，王杰、刘英俊、欧阳海、麦贤德、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拿诗人贺敬之的话说，已然国人心中一个个高大的“生命群峰”¹，政治地位被抬到了吓人的高度。被宠坏了的军人少不了任性且自命不凡，让这样的武装群体介入乱局，无异驱虎豹入城郭，必然生出许多飞扬跋扈、胡作非为的鲁夫莽汉，群众稍有不逊甚至冒犯，军人必会毫不留情施以铁腕，坚决镇压之²，

第四，军内本来就山头林立，来自不同派系的军头，总免不了矛盾抵牾；如昆明军区的主要领导（如李成芳为代表，以及13军军长吴效闵、14军军长梁中玉等）多出自原薄一波组建的原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来自湖北的副司令员陈康注定鲜有话语权了）；其次——这几乎是一个规律：军人作战时同仇敌忾，生死与共，而论功行赏之时，相互攀比，心怀不满（甚至刀枪相向）之事则不乏其例，云南军区政委张力雄，1932年即入党参军，功勋卓著，1955年授衔，以军级干部之职仅获大校军衔，心中自然不爽——这类矛盾在安定环境下相安无事，一旦天下大乱，特别如文革这类内乱，矛盾一经触发，势必给社会乱局烈火浇油。中央在解决云南问题时多次指出：要解决云南问题，根本的就是要解决“两级军区”（指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军区）的问题。这在全国不能不说是一大典型。记录云南文革，笔者注定将在此问题上大费笔墨。

第五，军人执掌大权，稳定则稳定矣，新的麻烦则更多。特别“新生红色政权”建立

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第79页

¹ 贺敬之长诗《雷锋之歌》

² 如四川的“二月镇反”、湖南对“湘江风雷”的全面镇压，等甚至不惜开枪屠杀。青海323血案主角、人称“屠夫”的赵永夫，校官一个，正因杀人而一夜间暴得大名。

之后（据统计，县级以上的革委会军人担任主任的达达 97%。¹）同一部队战友，吃、穿、用、打“一条龙”全垄断，物质利益交换随心所欲，人事安排调动，包括农村家属、子女生活、工作安排诸多难事，皆成举手之劳，从而“走后门”“请客送礼”“利益输送交换”成风。当时，云南盛传一句段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军代表支左全家进城”。文革后此类风气满世界蔓延，严重败坏了全社会道德……笔者这些悲观主义的判断，读者下面将次第看到。

云南军队支左，一开始遇到的难题就是：由谁挂帅？本来当非秦基伟莫属：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昆明军区政委、闻名世界的上甘岭英雄……可是问题来了，第一、1月份刚发生的阎红彦事件，秦在藏闰保闰过程中做了许多抢眼动作，引起造反派公愤，阎红彦一死，“秦基伟是云南军内最大走资派”、“打到秦基伟”的大字报与大标语马上贴满昆明街头；第二、与社会应和，昆明军区内部也出现打到秦基伟的造反组织；第三点最要命，其时打倒“大军阀、大土匪”贺龙的狂潮已在京城掀起，西南军区时期，秦基伟作曾多得贺龙关照，坊间盛传，秦基伟的夫人唐贤美、重庆大学校花，正是贺龙作月老牵线，玉成如花美眷，一顶现成帽子“贺龙黑干将”扣上，必死无疑。昆明军区的造反派与社会上的造反派里应外合，直接抄了秦基伟的家。一个月前秦还在保卫闫红政委，现在却逼得学习阎红彦，带几个参谋躲去昆明远郊干海子炮四师驻地办公起居，偶尔回昆便遭军内造反者揪斗罚跪，幸得周恩来关照，1967年春节一过，周就派专机以治病为名将其接去北京保护起来。因为“贺龙线上人”，秦基伟到京后亦不得安生，常有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将其“喷气式”揪斗，上层纷争日烈，后来也就没谁来保他了。1968年10月，秦被“护送”湖南省汉寿县军垦农场接受劳动改造，荒郊野地种菜，有一天甚至被迫挑三十二担大粪。²此为后话。

¹ 程光：《心灵的对话》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380页；《邱会作回忆录》第540页说先后派出“三支两军”近三百万人。另有资料称：至1971年底，全军有22万余名干部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刘志青：《“9·13”事件后军队的揭批运动》，《党史博览》2005年第7期。

² 秦基伟（1914.11.16—1997.2.2），湖北省红安县人。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历任昆明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等职，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司令员无法就位，理当由政委李成芳上阵。李成芳，1929年参加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共。历任红四方面军班长、排长、连指导员、营教导员、总指挥部通信营政委。抗战时期任山西决死队一纵团长、参谋主任、第一旅参谋长、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十一旅旅长，中原野战军九纵政委，二野14军军长。建国后任二野四兵团军长，西南军区副参谋长。一看简历“山西决死队”五字，就知道李成芳的文革之路已岌岌乎殆哉：1967年3月16日，以薄一波为首的61人叛徒集团旧案被中央文革抛出，而“山西决死队”的创建者，正是这个“叛徒集团”的头子，李成芳焉能不被牵连？中央宣布云南军管是2月份的事，61人叛徒集团这枚炸弹尚未引爆。李成芳顺理成章暂时顶替落难司令秦基伟，将云南边疆的军管拉开大幕。

1月30日，根据1月2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昆明军区接管了中国民用航空云南省管理局，这是“云南省第一个实行军管的单位”。

从2月2日起，由部队派出人员分10批接管了云南省公安系统、邮电系统、交通系统、铁路系统和省商业厅、省粮食厅、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日报社、云南人民广播电台等机密要害部门和云南锡业公司，东川矿务局、安宁钢铁厂（即昆钢）等大型厂矿企业。

3月9日，《关于当前组织春耕生产中有关执行政策，加强经营管理，推广先进措施的一些问题的通知》这个完全属于地方行政工作的政事文件直接由昆明军区党委向全省发出¹。9天后的3月18日，再发《关于加强城乡市场管理，坚决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的通知》，规定立即恢复和加强市场管理机构，大小春征购期间，粮食主要品种不准上市，云云。

3月11日，根据中共中央命令，由边疆地区的边防军分区对丽江、保山、临沧、思茅（今

¹ 具体内容有：一、社队规模问题，春耕大忙中一律不准调整；二、土地、大牲畜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凡属生产队所有的生产资料，队与队之间，不准再打乱重分或进行调整，更不允许私人借故侵占集体生产资料；三、集体经营的副业，只许搞好，不准“下放”单干；四、凡是按政策规定划定的自留地，现在一律不准调整。· 严禁乱开乱挖，任意扩大自留地；五、对于农村中的各项政策，凡是没有作新规定的，一律按照原规定执行，不得任意更动；六、农田基本建设“三改一固定”必须坚持进行，严禁毁林开荒；七、生产队必须突出政治，搞好经营管理，评工记分；八、对于先进的增产经验和措施，如推广良种、种植绿肥，施用化肥等，必须坚持，不准乱加罪名，予以抵制。”

普洱）、红河、文山等六个专区（州）及所属各县全面实行军管，以各军分区党委为主，与当地驻军党委共同组成专区（州）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各县人民武装部或边防团为主，组成各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县以下的区和公社派驻军事代表。

3月18日，昆明军区党委发出《关于边疆第一线县文化大革命改为正面教育的意见》，决定：“边疆第一线县（包括：泸水，福贡、贡山、碧江、盈江、梁河、陇川、瑞丽、潞西、镇康、耿马、沧源、西盟、勐海、孟连、景洪、勐腊、江城、绿春、金平、河口、马关、麻栗坡、富宁等县，腾冲县的边沿区和畹町镇的文化大革命改为正面教育，不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边疆一线解散了各种造反组织，停止内外串连，不准揪斗干部，不搞“夺权”。

3月20日，根据毛泽东3月3日关于“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的批示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3月18日《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的精神，昆明军区成立“云南省工业生产领导小组”，由副司令员鲁瑞林任组长、副政委王砚泉副组长，并于3月20日至23日召开云南省工业、交通、计划、基本建设、财贸工作会议，布置工作，同时要求各地（州、市）、县相应成立工业生产领导小组作为组织工业生产的指挥机构。会后，昆明军区派出了大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厂矿企业单位组织“抓革命，促生产”。

3月3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成立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由15人组成：主任李成芳（昆明军区政委）、副主任张子明（昆明军区副政委）、黎锡福（云南省军区司令员），委员鲁瑞林（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田维扬（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徐其孝（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王砚泉（昆明军区副政委）、张力雄（省军区政委）、丁荣昌（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省军区副司令员）、李明（省军区副政委）、谷自珍（省军区副政委），刘懋功（空军昆明指挥所主任）、吴效闵（陆军第13军军长）、翟鸣武（陆军第14军副政委。军管会于4月5日正式挂牌

办公，对全省实行全面军管。在已建立6个边疆专州军管会的基础上，又建立了昆明市、东川市、曲靖专区、玉溪专区、楚雄州，昭通专区、大理州等7个军管会，并对省级35个机关，37个大型企事业单位派驻了军总代表。共派出军总代表和副总代表142人，加上派往基层单位（包括专、州、市、县）的军代表和“军宣队”，总计派出2.5万多人……

军队填补了权力真空并直接发号施令，1967年2、3月的云南社会确实出现了短暂的和平，但相伴的问题很快发生。军人走上前台，其政治观点，具体说，他们倾向哪一派：“八二三”？还是“炮兵团”？亦在群众面前很快暴露无遗。军管会的军官们必然会因此受到某一派的追捧，同时亦遭遇另一派的抨击。军管戏注定很难顺顺当当演下去。

按照一般意义上的所谓军管(military control)就是“军事控制”之意：“当国家处于危急状态，文职政府已丧失行使职权的能力，军队便往往以此为由，临时接管政府权力以控制局势，恢复社会秩序，直到自己认为已达到目的方才解除。”军管时期，军事当局对社会问题具有绝对的处置权力。而文革期间参与军管的长官权限，却完全受制于由北京最高层的界定。关于云南军管，周恩来曾做了如下指示：

云南省委、省人委的事情，不能长期瘫痪，云南是边疆，生产的问题，军队的边防、备战、援越抗关的问题，中央委托军区李成芳同志负责，云南大军区省军区组织一个领导机构，来推动帮助你们三结合。不光是两个军区领导，省委、省人委的负责同志也要站出来参加工作，云南实际上是实行军事管制，但对外不公布，报上也不登。目的是推动你们工厂、机关、学校大联合、三结合。然后提出三结合的名单报中央，当然要征求你们的意见，中央同意了就登报、广播。红旗三、四期社论给了你们原则帮助，上海的文件更作了明确的规定，你们回去认真学习。大家在大方向一致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求大同，存小异。¹

¹ 1967年2月28日周恩来、谢富治接见云南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时的讲话。载823“凤展红旗”编印：《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

如今虽然军管会已经正式挂牌，但让军人“推动”和“帮助”工厂、机关、学校“大联合、三结合”任务并没有改变，事情也就并非军法如山。前台表演的主角依然是造反派群众，加上背后的“技术指导”：地方官僚，再加上充任导演的军人——如是，各方利益彼此争斗的“三国演义”紧接便开始了。

必须肯定，云南军人对毛泽东和周总理的指示是挺当回事的。为了确认谁是左派（造反派）、谁是右派（保守派）？确实做了不少调查研究。昆明工学院八派学生刘光华回忆说，1967年3月8日，他突然从广播里得到通知，黄兆琪要他、石峰和汪守学马上到校门口上车，车开到东风路春城饭店，到某房间，方知来人系十三军军长吴效闵和十四军军长梁中玉。对方告诉说：毛主席要我们支左，我们不知道防区内哪些是造反派，哪些是保守派？“我们根据掌握的情况逐个地区向他们作了介绍”刘回忆，“除了昭通情况我们不清楚，未谈，其余的，他们都按照我们介绍的支持。唯一的例外是：个旧没有支持 128，反而支持了 223。”个旧的当事人张振均¹亦回忆说：“支左部队开到个旧，两派都到路口欢迎，结果军队对 128 不理不睬，歌舞团文化界造反派占多，大家热心热肠排在路边载歌载舞，结果惨遭冷遇，女演员们回来大哭了一场。”（关于这一状况，想必如本章第一节所说，13 军参加过个旧“四清”，对 128 派中的“牛鬼蛇神”抢班夺权有先入为主的反感。），后来，128 于是彻底反水，投入了反 13 军的炮派。

刘光华所说驻云南两个野战军情况，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昆明地区参与军管的军事机关，事前已经组织精干队伍从如下几方面对群众组织作了摸底调查：政治态度、人员构成、是否有走资派幕后操纵、成立时间及从事过的主要活动，等等。据初步调查，军管人员得出的观点是：参加八派组织的群众，大多造反资历较老，造反精神较强，所做出的过火行动较多；从人员构成上看，家庭出身不好的多，历次政治运动中犯过错误、受过冲击的人多；年龄层次上，则年轻人居多。参加炮派组织的群众，大多造反资历较浅，造反精神较

¹ 即上一章谈及的个旧最早的造反派“联司”一把手。

差，其中不少组织与“当权派”“走资派”暗中还有这样那样的联系，有的组织则干脆就是由官办的保守组织改头换面而来；从人员构成上看，其中家庭出身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多，老党员、老模范、老积极分子多；从年龄层次上看则中年以上的偏多，等等。他们重点审查了昆明机床厂“11·8”战斗兵团、云南汽车修配厂“11·30”战斗兵团、省建筑公司的“1·26”兵团以及省砖瓦厂“11·29”等共17个群众组织，并将其中的15个组织内定为反革命组织。至于各大中学校的造反派组织，则无须调查就成为当然的革命左派……¹

事实上，从2月2日云南军队局部进入地方就已经出了状态。资料记载：“三月初，公安厅军管后的政法组长丁荣昌在一次业务会上布置说：‘要搞掉53个组织，包括11·29、11·30、11·23、昆明市邮电工人总队、市政燎原，呈贡大联合指挥部、东方红（普坪村电厂），11.22等革命造反组织。’”“张力雄定了调子：‘邮电局问题严重，不是造反派夺权，而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右派翻天，是反革命夺权，所以要去接管’”“2月28日，在丁荣昌指挥下，四辆卡车架机枪进驻市邮电局，3月10这天早上，召开全局职工大会。会议一开始，就宣布拘留证，宣布拘留邮电工人战斗总队负责人杨XX和战士孔XX等二人。”“3月14日，张力雄……出动大量武装队伍，对呈贡大联合指挥部进行突然袭击，进行围剿，逮捕了该组织的二个负责人。呈贡大联20000万战士重新被打成反革命。”²“3月23日，在张、丁指挥下，由公安厅军代表组成的‘11·30’专案组，根据该厂保受组织和云南军区派出去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所提供的材料，发表‘公告’，宣布“11·30”为反革命组织并逮捕了施光星等5人”。“2月22日，云南军区副政委李明亲自率领一个团二个营

¹ 参看杜德威回忆录《文革风云映滇池》。杜所称军队态度，应当主要指云南省军区的态度。从下面对造反派采取镇压行动的张力雄、丁荣昌等人，均系省军区领导。

² 据《中共呈贡党史》记载，1966年夏，张力雄担任昆明近郊呈贡县四清工作团负责人，曾将“县人委及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的部分职工以大字报的形式向呈贡“四清”工作分团党委、县委、县人委以及各单位领导提出批评意见的呈贡“四清”工作分团党委、县委的‘部分职工’错误地进行隔离审查”，制造了轰动一时的“七·七事件”，故而呈贡后来成为了云南省整体造反最为强劲的县之一。1967年1月27日，该县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夺权成功，《云南日报》给予报道。在北京所谓“二月逆流”风潮下，3月13日，“由省军区副参谋长陈家贵带1个连的兵力，乘4辆解放牌汽车赴呈，执行抓捕县造反派头目韩棋、姜心义等人的任务。晚，陈家贵在县武装部召集有关人员开会下达抓捕任务，抓捕行动于3月14日凌晨展开，人称“三·一四”事件。

的兵力，全副武装包围了云南砖瓦厂，把‘11.29’所属8个战斗队的办公室洗劫一空，逮捕了最早起来造反的韩冠、李炳坤、曾厚森，以及其他5个有历史问题的人。由云南军区印刷了二百万份“公告”，以“南下串联别队”“新云南”等群众组织的名义，宣布取缔”¹……

必须说明，上述遭遇镇压的，均系造反最早的八派组织；而采取鲁莽军事行动的张力雄、丁荣昌等人，均系云南省军区领导。势头正盛的八二三派和省军区自此结怨。

事情有点军人执政的霸道和率性而为了。亦很像四川“二月镇反”、湖南镇压“湘江风雷”的微缩版，而且动作比四川湖南这些内地省慢了半拍。

就在省军管会正式挂牌的第三天，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社论指出：“现在有一股逆流，抓住革命小将的某些缺点错误不放，全盘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甚至支持已经垮台的保守派组织进行翻案活动，把一些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6日，中央军委又发布《十条命令》，强调：“不准随便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全国各地很快掀起“彻底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高潮。

深受北京信号鼓舞的八二三派，立即向自己的政治对手叫板：距离军管会挂牌不过10天，一份批判省军管会副主任丁荣昌的大字报洋洋万言，很快贴满昆明的闹市通衢。大字报题云：《请丁将军下马》。文中历数丁的家庭身世、少年时代所作所为、及参加革命后的种种“劣迹”。大字报尤为吸引眼球的，是称丁在我驻某国外事机构任武官期间逛妓院，大失国格人格。大字报署名“八·二三缚鲲鹏战斗队”，实则为八派二号大佬刘殷农。由此，云南八派与地方军区没完没了的恶斗拉开了序幕。

更具喜剧意味的是，就在云南军管会正式挂牌约半月前的3月16日，中发[67]96号文件出台。文件名：《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出狱问题材料的批示》。被视作八派后台的军管会主任李成芳正好出自于薄一波的政治娘胎。此文件为两个月后由炮派搅动、声势浩大的“肃薄肃李”运动埋下伏笔，并导致这位军管会主

¹ “风展红旗”编印《昆明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一部分“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任最终被驱逐之¹。

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军队支左许多人也卷到派性里面去了。一些人卷到这一派里，另一些人卷到那一派里”²。我们很快会看到，云南军队这种局面实在太明显。具有派性的云南造反派和具有派性的云南军队彼此互动，如力学上的机械共振，很快将振幅放大到可怕程度，最后造成灾难般的社会断裂。

三、老干部的焦虑和迷惘

毛泽东一贯主张“在游泳中学游泳，战争中学战争。”。以上海“一月革命”为标志的全国夺权乱局历经一个多月，毛泽东以为“基本经验”已经成熟，并通过《红旗》第3、4、5期社论加以表述总结之³，这个经验就是：“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再概括得简单些，就是两句话六个字：“大联合”“三结合”⁴。“大联合”是指造反的群众组织必须实行联合，“三结合”则指权力结构组成必须包含三个要件：“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

从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发布“十六条”正式启动文革，特别是10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此，所有“当权派”全成了造反派群众狠追恶打的故敌宿仇，惶惶不可终日，全中国“洪洞县里无好人”。现在情况变了。群众组织知道了没有老干部参与，他们的夺权大业绝不可能被北京认可；当权派也蓦然发现，

¹ 1967年8月，李成芳被中央调北京暂作“寓公”

²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页。

³ 毛泽东通过一系列重要社论指导夺权，其中有三篇为泽东亲自审阅修改过的《红旗》杂志社论最为重要。一篇是1月31日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红旗》杂志第3期（2月3日出版）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他将基本经验总结为：第一，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大方向。第二，“坚决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团结广大群众。这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第三，“必须足够重视革命干部在夺权斗争中的作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他们可以成为夺权斗争中的骨干，可以成为夺权斗争中的领导。”第四，“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第五，“在夺权的过程中，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其余两篇是《红旗》杂志第4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和《红旗》杂志第5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

⁴ 3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4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

自己依然还是个香馍馍呢，毛泽东和造反派最终都离他不得呢，他们现在的困境仅仅是：群众组织已经分为两派，均自称“左派”，你死我活，大打出手。而且军队也各有所认，在两派间选边站队。老干部们该如何押注方才保险？

为说清这个问题，需先简说云南干部的基本组成。共产党接管云南，地方干部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宋任穷带来的西南服务团¹，第二部分是进军云南的二野四兵团历年转业地方的干部²，第三部分为云南地下党和边纵³人员。由于云南特殊情况，第三部分人员数量较多势力较大⁴，共产党接掌滇地不久，即将原地下党云南工委书记郑伯克⁵调离，然后对原地下党成员调省委党校集中学习审查，将其中地主、土匪等异类加以清洗；1957年再通过“反右”和“反地方主义”，“揪出郑敦、王镜如反党集团”⁶，不少干部被划为右派⁷，一般地下党员多为知识青年，无问题者均安排政府业务部门做了处长、科长和业务骨干，身居高层者基本淘汰出局。三部分来源的干部经历长期共事和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彼此有了定位上的认同、工作上的默契和情感上的融合，同时积累了不少暗伏的矛盾甚至冤仇，但最高层的大权始终掌握在谢富治、阎红彦、周兴等一干“五湖四海”之人手中，直接由中央制衡，十多年没出大问题，直到文革风飙乱起，所有隐忍未发的矛盾才终于彻底引爆。

¹ 西南服务团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是二野遵照党中央解放大西南指示组建起来的。目的是为解放和建设西南地区而准备的干部队伍，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中央从老解放区党政机关调集的干部，即到西南后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骨干，一部分是二野、华野在渡江战役后，在华东地区各大中学招收培训的学生和知识青年，加上部队到地方的干部，共17000多人，分配到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各党政机关工作。总团长为宋任穷。

² 二野四兵团下辖13、14、15三个军。15军（秦基伟任军长、谷景生任政委）入滇不久即调赴参加朝鲜战争。后担任云南省委副书记的薛韬，即为15军离滇前以师政委之职转入地方工作。后成为炮派组织后台的农业厅长张振军等，亦跟薛韬留下地方。1950、60年代因各种原因，由13、14军转至地方任职的则更多。如文革中的活跃人物侯良辅、张克、李体润等。

³ 边纵全称“滇桂黔边区纵队”抗战后地下党建立的地下武装，以知识青年为骨干，最后发展成五万余人的主力，县区民兵十万余，十二块游击区。

⁴ 云南地方军阀卢汉为对抗蒋介石中央势力入滇，一直暗中倚重中共云南地下党，使之得以大力发展壮大。到了共产党兵临滇省，云南地下党甚至公开在专县扯旗放炮大发展，并抢占地盘。

⁵ 郑伯克解放初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云南省委组织部长。

⁶ 郑敦，广东揭阳人。1938年加入中共。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滇黔边纵队”副政委。1957年被化“右派”并定姓“郑王反党集团”前，任云南省委组织部长。王镜如为副部长。该反党集团案于1979年4月平反。

⁷ 《当代云南大事记要》载：云南省管以上干部中当时仅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就有158人。

我们已经看到，如果阎红彦不死，云南的“三结合”干部解决起来可能会容易许多。对于干部和军队，他的“老陕北”资格和上将军衔放在那里，大家不能不唯其马头是瞻，当年世界闻名的将军秦基伟，在他面前都“老爷子”长“老爷子”短地尊奉不迭。对于群众，闫的民愤其实也不大，无非文革伊始，犯“方向性错误”，做了些得罪人（尤其大学生）；其次，到批“资反路线”，他的认错态度还是不错的。于是说起得罪人，群众更愿意迁怒于孙雨亭，笔者搜集了数十份云南省委机关“战斗队”或实名大字报的原始抄件，矛头全部对准孙雨亭，认为阎红彦之所以犯错误干坏事，皆因孙雨亭这个“笑里藏刀”“阴险狡诈”的“实权派”“野心家”在背后出主意操刀。闫1月8日自杀，12日中央向“云南革命群众”发来“支持电”，17日，昆明各界造反派约10万人就在检阅台召开了“首次打倒孙雨亭大会”；22日又在检阅台召开“打倒孙雨亭第二次大会”。批斗会上，众人强逼孙雨亭交代“在太原写拥护国民党三民主义的问题”，宣布他为“叛徒”“笑面虎”“闫老二”。省委机关红旗战斗团还与八二三红卫兵于16日共同组成“打倒孙雨亭联合作战部”。诅咒“大党阀孙雨亭是云南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真正主帅”，大字报大标语一时铺天盖地。难怪八派二号头目刘殷农临死前完成的回忆录中如此慨叹：

（阎红彦）就任云南省委书记后，为云南人民做了不少好事，他那在民间普遍流传的“边疆特殊，民族落后”八个字，使云南人民得到了不少照顾和实惠，他**如果不自杀**，经过文革的洗礼后，很有可能会是后来三结合的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

可惜历史不承认“如果”。阎红彦匆匆忙忙死了，云南一时却无满足条件出来担纲的干部。2月10日，中央电召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周兴、赵健民、郭超、薛韬、省委常委刘林元、省委副书记周力赴京讨论云南局势，研究对策¹。这6个人显然经过中央慎重考虑遴选，都是有可能成为“三结合”的种子选手。

¹ 军队代表（昆明军区政委李成芳和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及群众组织代表（八派为黄兆其、刘殷农、杨树先、姜月生等；炮派为方向东、李毅、沈参雄、杨凯等）亦同时电召进京与会。孙雨亭被中央排除在外

6个老干部以资格论，薛韬和周力略显稚嫩，其余4人均完全有可能担纲，其中尤以周兴为最，他长期从事保卫工作¹，对领袖的忠诚毫无疑义，还有，文革前就位居省长。他的问题也恰恰是长期搞保卫，江西时期就参加“打AB团”，延安时期又参加“抢救运动”，自知得罪人不少，于是学成了一只“乖乖猫”，政治上十分低调。2月28日周恩来接见上述云南来京人员留影照相，赵建民和郭超都直挺挺站第一排，周兴偏偏躲最后一排角落，表情猥琐，像刚犯了错的留级生；就能力言，赵健民显然足够站出来担纲，只是在军区门口保卫书记那一回动作尺度太大，在群众中留下印象实在太糟，以至于在周恩来先前讲话中被两次点名，说：“另一书记赵健民被同学发现后却坐车想走，反而向群众挑衅，连郭超也说了真话，的确赵健民在宣传车上，在主席像前指手划脚辱骂群众，这是反革命的行动，并说：‘知道了也不告诉你们’，没想到这样的人在群众面前讲这样的话，当然使群众激愤，游了街，戴了高帽子，这样的领导不是上对中央毛主席，下对群众负责。这样的人怎能当领导呢？”²2月28日的合影照赵健民虽站第一排，却灰头土脸颓然乎其间。与上述二人相比，郭超好像气色更好，长期做经济工作，省计委主任兼建委主任，大权独揽，有“经济沙皇”之称，每年少不了跑北京开计划会，找各部委要钱要项目，与国务院交道多，周恩来对他多有印象，这回阎红彦死，周恩来专门当众表扬郭超“说了真话”，显然是向他单独询问过，并采信了他的奏本。

个子高大的郭超和赵健民均出自山东地下党，且赵正是郭的入党介绍人。1960年代，二人先后调入云南为官，赵为省委工业书记，郭为计委主任，老乡、老关系加老上下级，相处应挺不错的。可偏偏遇了机关“四清”，任职于云南省轻工厅的郭超夫人赵森被厅长

¹周兴（1905—1975），江西永丰县人，1925年加入共青团，1926年转入共产党，1927年周兴随朱德的教导团参加了南昌起义，后进入井冈山根据地，先后担任江西省肃反委员会秘书、侦察部长、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长征途中，周兴任红一军团保卫局副局长、红军干部团特派员。长征到达陕北时任西北保卫局局长，后西北保卫局改为边区保安处，一直执掌这个极其重要的情报部门，也就成了资深的特工首领，是共产党隐蔽战线的重要领导人。建国后历任公安部副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任常务副检察长、1961年秋，调山东省任省委书记处书记，1965年初调云南工作，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云南省省长。

² 1967年1月14日周恩来接见云南群众代表时的讲话

林亮“修理”，郭一怒之下就派人前去轻工厅“收拾”林亮。按赵健民大字报的说法，就是：“郭超不经省委同意**非组织**地开会，亲自动员斗争轻工厅长林亮同志。我是分工工业交通工作，也根本不给我打招呼，直接命令工交政治部付主任李体润、组织部长陆启余组织斗争林亮。”文革开始后，1966年11月开“三干会”，受了郭超欺负的林亮遂不依不饶地“专门找阎红彦去工交厅长组，听取他揭发郭超的错误，林亮对郭超的错误讲了两个多钟头”¹

如果说因为林亮的四清公案，赵、郭二人来了个“狗咬狗，两嘴毛”，那么就阎红彦死事，郭超在周周恩来面前大唱高调，狠奏了赵一本且周又深然之，赵健民由是要对郭超深恶痛绝，甚至公开宣布他“从来没当过郭的什么入党介绍人”，就理所当然了。还有，赵健民后来成为炮派大后台，而郭超反之，成为八派推荐的干部，同样也就理所当然；还有，林亮后来要铁心跟随赵健民，大闹云南文革舞台，同样也顺理成章了——一直待到文革烟消火灭，神、鬼、鸡、凤重归旧位，赵健民这才礼节性地向郭超做了一番检讨，郭也回报一番礼节性的检讨，算是冤冤相报终有时，相逢一笑，泯了恩仇²——此为后话。

6位“种子选手”年龄最大者刘林元（59岁），云南本土通海县人，1925年参加革命，长期在滇越铁路及“个（旧）碧（色寨）石（屏）铁路”领导工运，1927年加入中党，次年被选为云南铁路总工会主席，1936年底赴延安，历任延安职工学校党总支书记、中共绥西地委组织部部长等职，解放后历任云南省总工会主席、省委常委、副省长等职。蹊跷的是，北京归来不到两月，4月21日，刘林元便在昆明西郊岷山一条荒沟自戕而亡。刘死后，省军管会专门成立一个有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参与的调查组开展历时数月的调查，结论是自杀。可为何自杀？几十年后依旧一笔糊涂账。2000年官方编纂的《云南省志》在“刘林元惨死岷山”条目对此事作了如下表述并提出质疑备考：³

¹ 2月18日赵健民大字报《从叛党分子阎红彦等几个人罪恶事实看他们是否在云南省委中组成了反党集团》（见炮派机关报《914战报》1967年8月16日 第四版）

² 2017年4月25日笔者对郭超秘书、时任云南省计委秘书长胡延观的访谈记录。

³ 《云南省志》第1064页

1967年4月20日，“炮派”在昆明医学院召开大会，支持革命领导干部站出来工作。省委常委、副省长刘林元被邀参加大会，并表态，愿意同广大的干部群众站在一起。当天晚上，他突然失踪。4月21日在昆明西郊岷山，三个捡柴的孩子发现他的尸体，即向西山区武装部、公安分局报告。经公安部门现场察看，死者头部有弹孔，右手握有手枪，查对手枪号码、持枪人姓名，并现场辨认，死者确是刘林元。省军管会接报后，由副主任黎锡福连夜召集政法部门和各派群众组织代表开会通报情况，研究案情。22日上午又到现场查看分析，省军管会主持有关部门抽人组成“刘林元专案调查组”进行调查，提出了疑点：

（一）刘当时并非两派群众组织“炮轰”、“火烧”对象，运动对他的压力并不大。两派群众组织还准备把他列为结合对象，没有迫使他自杀的客观因素。

（二）如果他要自杀，可以在家里进行，不必去到离城9公里的岷山上，走那么远的路，爬那么高的山头，他年老多病，身体不大好，有无外力的迫使？

（三）刘习惯使用左手，而死亡现场是右手握枪，子弹由头部右侧太阳穴射入，伤口处无火药喷烧痕迹。¹

（四）据刘的家属提供，刘死前没有异常反映。但在失踪的当天发现家里有人来过，桌上有三种不同牌子的烟头和9张水果糖纸，还有放在3个位置未吃的水果糖。

治史必须史料佐证。几十年过去，关于刘林元之死几乎已不可能有新证据发现了，我们只能借助逻辑推理暂时搭建一段桥梁以使历史书写继续下去。为此，这儿必须提到一个成立于1967年1月5日的奇特组织：“云南省中上层干部联络站”（简称“干联站”）。厘清该组织来龙去脉，或能找出藏于其中的死亡密码。

云南的民间文革史料和心理印象，往往将“干联站”和1967年8月大张旗鼓成立的老

¹ 据参与现场处理的昆明工学院学生张培志、刘光华介绍，弹孔处皮肤有明显灼伤痕迹

干部专业造反组织“摧资兵团”¹相提并论，混为一谈。而在官方史料定义云南文革16个主要冤案²中，“干联站”被单列，排名第三，具体记录共150余字：

云南省一部分干部于1967年1月5日为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组织，共有107人参加，其中厅、局级以上干部29人，处、科级干部65人，一般干部13人。该组织成立不久，为响应中共中央归口大联合号召，同年3月10日即宣布解散，仅存在65天。

‘划线站队’中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其成员遭到残酷迫害，有的被迫害致死。

文革运动开宗明义，就是整党内走资派，所谓运动斗争大方向，显然是矛头向上、即各级领导干部。云南的中上层干部们竟然抱团组织战斗团队以捍卫自身权益，在全国确属绝无仅有。除官方记载准确的人数、存活时间之外，领头者谁？成立背景？直接诱因？始终如影子一般模糊，以至于多达数十万字、实时记录的八二三派编印的民间大事记《风展红旗》对该组织竟未着一字，此事从一个侧面说明823派对干部问题何等麻木；相反，炮派的“草包司令”方向东对此却大胆坦承，他说“去年十一月份，我们就开始做干部工作，后来组织了中上层干部联络站。干部联络站，对干部站出来亮相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干部联络站工作没有多久，就遇到了阻力……把干部联络站打成‘黑司令部’‘炮兵团的黑后台’等等。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下毒手杀害了刘林元同志”。³对“干联站”略作探究，确可窥见云南文革一道独特的政治风景线。

先看的成立时间：1967年1月5日。其时，全国批判资反路线已成摧枯拉朽之势，而云南省委老大阎红彦本人隐身避祸正如丧家之犬。如此背景下起来造反的干部无非四种：一是历次运动被整过的、倒了霉的、包括文革初期被批判、刚刚缓过气的……为了改变命运遂铤而走险（作为参照人物，最具代表性的当数重庆的罗广斌和四川的刘结挺、张西挺⁴）；

¹ “摧资兵团”在第三章第十一节有专门表述

² 云南党史研究室编印《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记实》第175页

³ 1967年8月4日在干部会上的讲话，见《914战报》1967年8月16日出版第一版

⁴ 罗广斌，著名作家，一部《红岩》即名满天下，皆因历史上从国民党监狱渣滓洞逃出，于是长期被市委压抑，文革伊始，从劳动地长寿湖渔场跑回造反，并投奔造反派，后自杀。刘、张1960年代曾分别任四川宜宾地委书记、宜宾市委书记，因受西南局李井泉整肃，文革遂投靠造反派为自己翻案，被中央确认为解决四川问题的“突破口”，翻案成功后

二是虽未倒过霉，文革亦未受冲击，但政治风云瞬息万变，深感无枝可依，不免惶惶，得投靠一个组织方感安心者，如政府业务机关大小官吏；三是深怕在革命运动中掉队，真心紧跟毛泽东表现点什么者（一般来说，机关干部阅世老道，不敢轻易下水，这类人数相对稀少）；最后一种，造反派批“走资派”大轰大嗡阶段已过，要得深入，必须搜寻“钢鞭材料”，这就得拉中上层知情者入伙。总之，几种因素叠加，促成了“干联站”的建立。

据昆工学生张培志介绍，后来成为干联站头目的李清祥¹，就是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去解救出来的。李清祥，山东人，曾任谢富治警卫员。谢离滇后，调昆阳磷矿当党委书记，工厂“四清”期间被清理，得老上司张克（组织部长）关照，调任省林业厅航空护林大队书记兼队长，管两架直升飞机和少许人马。后又被清理出局，解送远郊昆明市第二农场劳动。张培志告诉笔者，他看过李劳动时的生活环境，其肮脏污秽与劳改队全然无异。李文文化低，工作能力差且脾气暴烈，由他组织或主持一个组织可能性极小。云南大学林超民教授表述此节，说到该组织出头的厅级干部有张振军（农业厅长）、侯良辅（商业厅长）、林亮（轻工厅长）这几个干臣能吏，文革前，他们和省委顶头上司或许有些过节²，但说他们当时就公开出头，亦缺少实据。可以确认的，是这个组织在1967年年初确实成立并开始匆忙运作了。个旧地区“联司”张振钧证实，一月份，原省民政厅名白玉清的中层干部，就曾专程到红河地区串联动员州县干部参加“组织”，州县土官不敢轻易下水，遂纷纷来向“张司令”汇报。昆明医学院工军宣队负责人徐兴旺回忆：该校文革初期被省委公开宣布打倒的书记颜义泉不便公开出面挑头，就让总务处长王占元担任了召集人，成员有教学设备科长佟文祥等³，昆明钢铁厂的省革委常委高湘南介绍，参加干联站的干部至少有5个……

二人分别任四川省革委副主任和办公室主任，1970年被再度揪出，以“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之罪正式逮捕入狱。

¹ 云南历史教授林超民博客《催资兵团》一节介绍：“1967年初，由老干部李清祥发起，以农业厅长张振军、商业厅长侯良辅、轻工厅长林亮等为首，成立了有数百名全省中上层干部参加的“中上层干部联络站”，其办公地点设在翠湖宾馆，参加该站的干部大多吃住住在翠湖宾馆，由炮派负责保护。”

² 林亮和郭超的矛盾如本节前述。

³ 徐兴旺系元昆明电机厂党委成员，1968年参加工军宣队进驻昆明医学院，任副手。总务处长王占元系随军南下干部，山东人，性格暴烈，且家庭历史问题一直未得晋升。佟文祥为云南地下党成员，长期不受重用，后成为炮派达人。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架构如此庞大的全省性中上层干部组织，必然需要一个“大块头”方有号召力。此人是谁？与李清祥同院而居的云南省计委秘书长胡延观回忆，当时李为动员他入伙，曾多次声称省委领导刘林元正是他们的头。炮派头目方向东的一个材料更有说服力：“1967年3月6日，在刘林元家里，周超召集了一个干部会议。研究云南省‘三结合’干部的对象问题，周超主持会议。刘林元、林亮、侯良辅，周力，佟文祥、云大陈立新、陈新一、师院李术昆，南下部分同学参加这次会。赵健民中途参加会议。会上，分析了云南省的干部。对省委、部委厅局以上干部作一一排队。指定第一批站出三结合的7人，如：赵、刘林元、周力、祁山、赵守义、刘披云……同时提一批暂时不能‘站出来’的。宣布一批打倒的对象。会上还纷纷“赵书记长、赵书记短，一致推赵为第一把手”。¹简直就是一个“分封诸侯”的会议。

“干联站”显然犯了双重忌讳：1，与文革“整党内走资派”的目标反其道而行之；2，属于中央明确反对的跨行业、跨地区组织²。其很快被军管会宣布解散，本身已说明该组织非法。而刘林元即非主动染指，至少以被人拽去当了令牌，且陷入较深。故而3月5日干联站被解散，此后必然心有惴惴焉。

两派确实都想拉他入伙。昆工学生刘光华（八派）的回忆录曾写过他们去刘家做工作，云南大学中文系学生杜德威（炮派）也在回忆录中说，刘自杀前两天，他和同班一个同学，受造反派领导指使，到刘林元家中与他谈话，希望他参加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和革命群众一起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林元的态度是：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领导干部不能介入群众组织，在中央有新文件之前，他将坚持这样做。

访客肯定不仅此二人，而很可能是说客盈门。他成了拉锯对象。杜德威说那一天他们还想多谈谈，但突然闯进的两位不速之客，

¹ 方向东《我对黑手的揭发材料》1969年2月

² 其时，已经正式成立省革委会的贵州，已经向全国推广贵阳棉纺厂“以车间班组为单位”成立战斗组织的经验。1967年2月28日，周恩来在接见云南军队、群众组织及干部代表的讲话中，也明确要求“要搞归口联合”。3月3日至5日，两派代表在京讨论，起草了汇报提纲后返回昆明。3月13日，两派联合召开团、队长会议进行传达，并成立了“昆明无产阶级革命派归口大联合服务站”。

谈话中断，我们俩起身告辞。这两位不速之客，一个是八派昆明工学院的学生，一个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这位同学说：我总怀疑刘林元之死与那两位不速之客对他施加压力有关。

官方文件说“刘当时并非两派群众组织“炮轰”、“火烧”对象，运动对他的压力并不大。”笔者认为，事实恰恰相反，第一、既然两派群众都把他惦记上了，“还准备把他列为结合对象”，夹于二者之间，他不能不做出选择：或为铁锤，或为铁砧，思想注定压力山大；第二：中央关于薄一波 61 人炮团集团的文件 3 月 16 日出台，薄一波诸人本是按中央要求履行手续出狱，如今却定为叛徒。刘林元 1931 年奉命回滇重建受龙云¹当局破坏的云南地下党，曾遭叛徒出卖被捕，直到 1936 年 12 月方才出狱。他应该懂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历史旧规，薄一波案必然使他“物伤其类”，此老刘之第二层压力也；最后，也是最要命的是，4 月 1 日，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发表，正式打响了批判“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刘少奇的全国会战，一个致命杀器亮在刘林元面前了：1930 年莫斯科世界第五次职工代表大会，刘林元正好和刘少奇同台参会！刘少奇被选为执委留苏工作，刘林元则于次年初奉命返滇。“二刘”关系如此交结，而今刘少奇“大巢”已覆，刘林元焉能完卵安存？上面任何一个理由都足以将他压为齏粉。

杜德威怀疑“那两位不速之客对他施加压力”，说了什么话促成他走向死亡，这完全可能。家属说失踪当天发现家里有人来过，“桌上有三种不同牌子的烟头”，当时大学生抽烟不多，“三种不同牌子的烟头”说明有来自外地、更可怕的人前来发出威胁，将其逼上死路。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一书载，康生等人“亲自向南开大学‘卫东’和‘八一八’的头头部署调查一些老干部的所谓‘历史问题’，批准他们以‘中央特许’和‘中央专案组’名义，到各地任意抄家、抓人、审讯和查阅机密档案²、1967 年 6 月 26 日康生接

¹ 龙云为民国时代云南省政府主席。

² 见《大动乱的年代》第 225 页

见云南两派群众代表讲话证实，其时云南确有南开大学“卫东”和“八·一八”在进行调查¹。

至于“刘习惯使用左手，而死亡现场是右手握枪，子弹由头部右侧太阳穴射入”，这更不奇怪了。稍有《刑侦学》知识的人都知道，用刃器或钝器自戕者，一般都采取非惯用手实行，因为采用惯手，行为开始且感觉创痛，很容易因本能恐惧而放弃。使用枪支亦然。总之，刘林元继阎红彦之后，成了文革中第二个自杀的省级干部，

6位“种子选手”情况如此，那么云南最高权力究竟花落谁家？得看下面的表演了。

四、赵建民找“婆家”

一月初发生阎红彦死难事件，赵健民舍身护主，以至被乱民强扣高帽、罚跪游街，饱受凌辱，结果是非但没落得当局和同僚一句好话，反遭自己的下属郭超落井下石，最后遭来周恩来一顿克。赵健民心里肯定很受伤。

不过赵健民就是赵健民。他不会甘于寂寞也不会甘于失败。挫折只不过是再次一跃而起的强心针。为了表明自己紧跟中央、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拳拳之忱，北京归来，他立马开始写大字报“揭盖子”，揭发阎红彦的“叛党罪行”和云南省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据统计，从1967年2月11日起至8月16日，赵健民先后写了20多份大字报²，计有：《揭露省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罪行》7份，从“之一”至“之七”、《从叛党分子阎红彦等几个人罪恶事实看他们是否在云南省委中组成了反党集团（2月18日）》《周兴来云南的前前后后（2月21日）》等，初始时鸡毛蒜皮、不痛不痒，比如：“几年以来，阎红彦是不学习、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也不号召、促进、检查省委书记、常委、各主要成员学习主席著作的进行情况，我来云南的四年中，我没有看到阎红

¹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康生王力接见云南两派代表的讲话，《九·一四战报》第二十三期，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主办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

²《赵建民同志大字报节登》摘录自《九一四战报》1967年8月16日 第四版。《九一四战报》为炮派喉舌。八派人士提供的资料均指赵健民第一张大字报时间为1月，以表示赵由保阉到倒阉态度变化之速，讥其为变色龙也。此从炮派资料。

彦学习过一次毛主席著作。”“阎红彦连中央指示也很少看，他自己亲口说过‘中央来的文件这么多，我就是不看，除财贸方面的有兴趣的看一看以外，其他文件是不看的。多由秘书看了后说一说，自己听一听，确定怎么办理。’”后来就有点真刀真枪了，大字报指责阎红彦的工农业政策（如中央要云南支援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阎红彦漠不关心”“一些具体的支援，如汽车、被子等，他竟敢说出‘不给他，让他们从北京背来’的极端错误言论”），更要命的，赵直接对各书记揭短，把相互间的矛盾悉数抖开，如：“六四年要提刘明辉当省长。刘明辉的严重错误阎红彦是知道的，知道有严重错误而提名当省长，这不是一般的关系，这是他要建立反党宗派集团。”；又如郭超：不给分管工交工作的书记赵健民打招呼便组织斗争轻工厅长林亮……”“郭超斗争林亮事先并未告诉阎红彦、周兴，而郭超斗争林亮时却（撒谎）说请示过闫、周”等等，又如：“八月十八日（去年）后，工交口开始了一个炮打司令部运动的高潮。随后我在八月二十六日工交厅局长会议上又具体动员了向领导提意见。但事隔一天，郭超根据闫孙黑帮意见，事先不和我就一句，就在工交厅局长会议上讲：‘形势紧张，工交口停止向领导提意见，一致对外’扭转炮打司令部的方向对付红卫兵”；还有：“一九六四年秋批判于一川的错误时，厅局机关干部开始了对刘明辉、孙雨亭等人的错误揭发……一次常委会上我提议‘现在干部向省委一些领导人提意见是好事情，矛盾暴露出来才能解决矛盾，省委应动员大家彻底揭发以解决领导上的问题，’阎红彦当即说：‘你这是给省委出难题。’”“阎红彦把刘明辉、孙雨亭的错误包庇下来。周兴对阎红彦的错误（也）是维护得无微不至。他在去年九月在军区八号开的一次书记处会议上公然提出‘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是属于十六条中第三条的第一种情况的。’……周兴亲自动员‘要领会闫的意图，按意图办事。’‘闫的报告是马列主义的报告’。阎红彦叛党自杀时留了一个反革命字条，对此字条，周兴一再强调保密”对此，要问周兴：“对对革命战斗组织保密的目的何在？”

赵健民除了回昆明用大字报猛表革命决心，事实上，早在周总理接见云南代表当晚，他便单独进行了一次暗地行动：他与山东老乡康生事前预约了一次重要见面。时间也是2

月28日，也是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谢富治等接见完毕，他就在康生秘书张根成引领下来到大会堂南侧西小会议室。其时，康生正同西安群众代表谈话，疲倦不堪的赵坐在沙发等候，竟已昏昏小懵，直到被张秘书叫醒，道是康生同志要来了，赵才赶忙起身整衣。时间已是3月1日1时半。

根据赵健民本人的回忆，因为时间太晚，赵就把原来想反映的5个问题，去掉前边的2个，仅反映后边的3个。3个问题是¹：

第一，我们党的干部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是毛主席的指示，也是完全符合我们的干部的实际的，但现在云南、昆明党政机关普遍被夺权，领导干部普遍被揪斗，这是违反毛主席关于干部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指示的。而现在向造反派讲毛主席这一指示，没有人听。这是执行中的问题呀，还是理论脱离实际呀。中央现在应该对毛主席关于干部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一指示进行三令五申。

第二，省以下党组织应多开党代会，使主要领导干部经常接受监督。据我个人了解，云南、山东党代会开得很少，党员群众很难监督领导干部，因此，“文化大革命”一来，很多书记、部长下不了台。因此，今后省、县、基层党组织，应多开党代会；多发扬民主，使领导干部多受监督，这样大民主一来就不会下不了台了。我明确地指出，我所说的开党代会是指省以下党组织；不是指中央，因为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还有请外国兄弟党的问题。

第三，我在昆明看到中央接待站答红卫兵问的传单，上面写着“干部有错误就应该批判，但对好的、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应当拥护”等。我认为答得好。但这种观点需要中央三令五申才能得到较好的贯彻。

赵健民说：“康生听了我的意见后，先就什么‘刘少奇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什么‘61人叛徒问题’谈了一通，又谈党代会不在形式而在内容的问题。在谈及中央接待站答红卫

¹以下引文摘自《赵健民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号 YL1201543 04

兵问时，他明确说，接待站答的意见‘是对的’康生的谈话根本没有批评我的意思。他谈完时已近5时，就去钓鱼台休息了。”

上述文稿写于1980年代，魔头康生已被清算，而赵健民历尽磨难复出。他慨然叹说：“这次谈话在我来说，完全是出自一个党员关心党的事业，爱护党的利益，向中央反映的意见，当时我认为是正确的，现在我仍然认为是正确的。”“我反应的意见是希望省、县、基层党组织应该按照党章的规定按时开党代会，并不是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因为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有请外国兄弟党代表参加的麻烦。但康生（事后）却诬陷说‘你要求开党代会，是为了把刘少奇选人中央去’。一个党员，按照党章规定，向中央反映意见，竟被康生污蔑为“反中央、反毛主席”“是为了让彭、罗、陆、杨以用合法身份混入党内，夺党政领导机关的权”。

如果仅就1967年3月1日的康赵对话而言，赵的态度显然是真诚的，康的态度似亦未露恶意。但一年后的1月21日，同样在人民大会堂的接见，康生却断然宣布赵健民“是比较疯狂的，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并且，“凭我40年革命的经验，有这个敏感，我看你是个叛徒”参会的公安部长谢富治当场即派人将赵建民拿下，投入黑牢7年。地点是云南第三监狱，单人监舍黑暗、阴湿而窄逼，与地狱无异。以至后来被同囚于该监狱的八派领袖沈炳章去看过当年他们要拼力打倒的炮派“敌酋”监舍，竟止不住感慨万端，说：

赵健民真够坚强的！

云南多起文革史料说到康、赵分野，都认定自3月1日的对话始。为证明康生正是从该次谈话便有了陷赵之心，甚至传言：“康生与赵健民谈话后，立即向毛泽东汇报，诬陷赵健民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为佐证此说，还有传言称“31对话”后，康生专门找到在北京出席军以上干部会议的昆明军区政委李成芳、云南省军管会副主任张子明等，说赵建民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我对赵健民的讲话很气愤，已当面批评了他。你回去要把赵健民的这些错误转告云南的负责同志。赵健民的这些思想不知是受

了什么人的影响，很值得注意。”“李成芳从北京开会回到昆明……立即向他（指黄兆琪）传达了前述的康生诬陷赵健民的指示”等等¹。笔者以为，该传闻欲证明康生之阴险毒辣、两面三刀，心情大可理解，然以此立论，一则无信史可考，二则与此后的史实逻辑大有抵牾。5个月后的8月8日，中央“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中发（67）237号文）第五条就明确指出：“原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同志，站出来揭发和批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坚决支持。”，仅此一端，就足说明上述传言之不实。

相反，下面发生的事实，至少可以说明“31对话”对赵建民恰恰是一大鼓舞。回昆之后，他旋即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造反行动：

昆工学生刘光华回忆：赵健民“不顾昆明工学院造反派拉他游街的事，3次到昆明工学院找到我兵团办公室，向工作人员提出要见黄兆琪……工作人员不给他联系，也不理他。兵团的常委们也不见他。他只能从早坐到晚想等着黄兆琪，都未等着。他第三次到我兵团时，兵团才由师志汝²见了。赵健民开口说：‘我要见黄兆琪。’师志汝说：‘黄兆琪很少回学校，找不着。’赵健民又说：‘我有话要找黄兆琪说。’师志汝又问他：‘你到底有什么话要给黄兆琪说，我可以给你转达。’赵健民最后说：‘我要给黄兆琪请求，我要求参加八二三。’师志汝就明白给他讲：‘你现在要参加八二三还不够资格。你现在的任务还是要深入地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深入地检讨你跟着阎红彦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端正态度，争取早日取得群众的谅解。群众对你谅解之后，群众会接受你参加八二三的。’……赵健民碰了一鼻子灰。”³

赵健民又找过八二三派二号大佬刘殷农。刘这样回忆：⁴“赵在阎红彦死后，已经贴大字报揭发阎红彦和云南省委执行资反路线，他是以公开亮相的革命领导干部身份来见黄的。

¹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办《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实》第114—115页

² 昆明工学院学生，八二三学生领袖之一。

³ 刘光华回忆录《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实践和官僚集团的反攻倒算》

⁴ 同上

约见前，我和黄商量过，一是分析了他的来意，二是商量的表态。他的来意我们分析认为：他是想学‘西南的春雷’，当云南的李再含。对此，黄的表态是保留的，是不是真正的革命干部要由群众说了算。我对黄说‘造反派犯错误难免，但绝不能犯原则性的错误，被别有用心的黑手操纵。’我和黄统一思想后，赵如约来到了指挥部，黄和他单独谈了不到一小时，事后黄告诉我，‘赵三爷就是想叫我们支持他，在云南尽快地成立省革委会。’”

试问：文革当年，中央首长任何讲话，造反派都奉为圭臬，既然权倾天下的康生三番五次地将赵建民可疑之状告知八二三的军方后台李成芳，据说还报告过毛主席，这事难道不在社会上闹得天下熙熙？直接将其打倒便完了，何需这般推三阻四、礼让回避？

八二三让赵健民彻底失望的还有一件事：“八·二三大联合指挥部”在检阅台召开大会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会议原本由黄兆琪主持。不巧临开会前，黄忽有他事不得不离开，遂让昆工八二三二把手石峰代为主持。按议程，大会需将几个省级“老家伙”“请”上主席台低头站立以示批判，多数干部则留台下与群众席地而坐听会。按指挥部事前安排，赵健民属台下参会者，不想黄递给石峰的名单上，赵健民名字偏偏列于“台上”“台下”两类干部的分界线上，原文是：“赵健民及以下人员留在台下”。这就出问题了。

石峰回忆录如是说，黄兆琪走得匆忙，将“老干部名单交给我时，不知道是没有向我交代清楚，还是忙乱中我没有弄清楚。所以，在大会开始的时候，我误点了赵健民的大名，把他作为了群众批判的对象。当我叫到前面几个人的名字时，一个个都乖乖地走上主席台，低头站立，等待批判。但当我叫出‘赵健民’三个字时，他却坐在主席台下方不肯站起来。我连叫三声，他仍然不动。这时，台下立刻爆发出了‘打倒赵健民！’的怒吼声。到会十余万人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动了起来。此刻，会场前排的几个工人同志怒火中烧，立刻冲到赵健民跟前，扭住他的双手，把他押上了主席台……”¹

石峰认为这本是一场误会，说他事后专程到五华山“云南省生产建设指挥指挥部”赵

¹石峰回忆录《奇梦缘》第122-123页

健民的办公室，向他做了解释并表示了歉意。可惜木已成舟，一切都无济于事。赵健民没有原谅八二三这次致命的失误。

英国性格心理学家汉斯·艾森克把人的心理稳定度作横轴，性格内、外向度作为纵轴，将人的性格判别划分为4个象限。在这张性格图表上，赵健民显然属于第四象限，即“性格外向而情绪不稳定”者。这一象限的人，按照内向度和稳定度的不同配比，性格表现分别为躁动不安、喜进取、易激动、多变、乐观、积极……等等。这样性格的人往往不善于把情绪用理智先行加以过滤，而是迅速将情绪转变为行动——这恰恰是政客和官僚最忌讳的——更何况，八二三让赵健民这个具有丰富阅历、曾让许多人尊崇有加的“老革命”一而再、再而三颜面扫地，内心受伤之大可想而知。“此处不留爷，只有留爷处”。中央再三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云南除了八二三，不是还有一个炮兵团吗？赵健民去意已决。这个重量级人物的单边投注，其胆识、其勇气和能量注定给云南政治力量的天平带来巨大震动。

第二章 从426到528

五、“426事件”：云南首开先河的大武斗

从赵建民投靠八派失败事件，读者可以看到八二三当时何等倨傲和气壮如牛。他们有理由这样。首先，他们造反早、人多势多；其次，从“炮轰省委、火烧市委”到“批资反路线”，所有事实都证明他们每次行动都符合北京精神，“大方向始终正确”；第三，从1966年11月到第二年2月28日，中央首长将近10次接见，中央首长、特别是周总理对黄兆琪、刘殷农留下极佳印象，1967年1月13日凌晨，周恩来动员昆明群众撤出军区长达数小时电话的后半场，周干脆让黄兆琪替其代言，足见对其何等青睐！最后，以反八二三右倾为由头、教唆分裂的“北京南下兵团”，虽然曾如“救世主”一般不可一世，可面对以八二三为代表的造反派节节胜利，最后不但未讨到半点好，反挨了一顿克。陈伯达如此教训：“犯了

错误不要难过”“希望你们赶快回来（注：指回北京），不回来就会继续犯错误，还留在那里继续作指挥，就会犯更大的错误。”¹如今充充云南，就剩下受南下兵团撵唆，从大联合指挥部拉出自立门户的炮派，只可惜开张伊始，门庭冷落车马稀，暂时还难掀起大浪。八二三为何不能骄傲？为何不能头脑发热？

在陈伯达、康生等人接见云南代表的第三天，2月28日晚上，周总理、谢富治再次于人民大会堂东会议室接见了云南军队、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这次会议为云南大联合三结合定下调子。关于群众组织两派大联合，周恩来的说词是：

革命造反派既要夺走资派的权，也要夺头脑中“私”字的权，造反派是不是要真革命？不要在关键时刻关走资派的当，上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当，搞小团体主义，有“私”字，有“我”字，有了这些那革命就不行了，如果不革掉“私”字的命，总有一天要垮台。

周恩来所说头脑中的“私”字，以及后来在全国范围内长期展开批判的所谓“资产阶级派性”，实际是社会心理学术语在文革语境下的一种新的政治表述。所谓“派性”（或资产阶级派性），按社会心理学的分析，其实就是在无政府状态下集体化的人际偏见罢了。这种病态心理一旦形成，有意识的个性(individualite)就会完全迷失在无意识的集体人格(personnalite)之中。这种集体灵魂的特征是：群体的每一个分子都非常亢奋地完全处于无意识的因素支配之下，并服从于一种特殊的逻辑：集体逻辑。由于群众极度敏感，因此他们的情感、无论好坏，都是夸张而扭曲的，在革命年代，这种夸张和扭曲尤为明显，一点微不足道的心理暗示和精神感染便可使其做出可怕的行为。在平常岁月就容易泛滥的轻信，在动乱时期就变得越发不可收拾。哪怕最离奇的故事他们都会信以为真。感染了派性的人往往已不啻于偏离了理性，变得盲目、固执，几乎成了野蛮人并具有了野蛮人的所有特征，如突如突发的暴躁、热情、献身、对其他群体充满怀疑和敌意，必欲除之而后快。

¹ 见1967年2月26日中央首长接见云南群众代表讲话

偏见的产生多因社会群体间的利害冲突而生，正常社会里，“这种利害冲突表现为稀有资源（如工作、财富或自然资源等）的争夺”，而在文革特殊环境下，人们争夺的偏偏是一种无涉物质的政治认同感及与之相捆绑的政治权利，这种权利直接影响到每个人的人生前景甚至身家性命。正是这种被文革推向极致的阶级斗争制造出的偏见、进而由此演化出的政治获得感与被剥夺感，使整个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撕裂与大仇恨。在文革运动如火如荼的1967年，周恩来对云南两大派侈谈“夺头脑中‘私’字的权”，实在是毫无操作意义的说辞。

事实上，随着八二三派不断取得政治获得感的同时，炮派的被剥夺感亦相应不断产生，为了争取自身的政治认同及相应的社会权益，他们必然要以十倍的偏见和百倍增长的仇恨，与造成自己被剥夺的赢家拼死相争。

与炮派同样遭遇政治剥夺的，还有一个不容回避、人数庞大的群体，这就是刚刚在批判资反路线中被打垮的保守派群众。这个群体中党团员多、“先进”人物多，劳动模范多……总之，在文革前的社会地位排序中，他们长期处于高端层级。他们显然不能自认就此跌落，他们也需要在重新洗牌中获得革命身份的认同。最后，遭遇文革造反剥夺的，还有一个更具力量的派别：被统称为“走资派”的干部群体。

于是，在八二三这个文革“新贵”不断崛起的刺激下，上述3个群体很容易抱团取暖。尤其是走资派群体与保守派群体本身就有天然的政治血缘，他们一起跳进炮派的战壕，为他们共同的命运抗争就顺理成章了。首开云南大规模武斗记录的426事件，就在这样背景下无可避免地发生了。

事发前3天的4月23日，正好是“八二三事件”爆发八周年，八二三大联合指挥部在检阅台召开大会以为纪念。同时，炮派大本营云南大学和昆明医学院也举行了同样主题的大会，只是检阅台系昆明政治活动中心地，该处的大会自然最为隆重且最为瞩目，《云南日报》于次日几乎用了整版篇幅加以报道。消息的题目是：“昆明无产阶级革命派隆重集

会纪念“八二三”八周年”；眉题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的批判旗帜 发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副题是：“昆明部队负责人张子明同志在大会上讲了话，表示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愤怒讨伐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重炮再轰省、市委，坚决击退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报社的消息一本正经：

在“八·二三”八周年到来的时候，昆明无产阶级革命派，昨天分别在检阅台、云南大学、昆明医学院，举行扬“八·二三”革命造反精神，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无产阶级旗帜，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向云南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总后台，展开了总攻击。同时再一次向云南省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总攻击。当“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¹，“火烧市委”“重炮再轰省、市委的口号”响彻昆明上空时，无产阶级革命派想起去年“八·二三”以来八个月所经历的战斗历程，个个心情无比激动。人们纵情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规格的确够高。与此形成反差的却是，云大和医学院的庆祝会，军管会压根儿没派人讲话，这就有些显得冷落了。四个月前阎红彦自杀，进驻昆明军区的造反派为“有条件撤出”和“无条件撤出”分歧而拉出一个炮派，此时两方尚未彻底翻脸，炮团的主要头目和群众亦被邀请参加了检验台的大会。军管会张子明的讲话笼统泛指“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是无任何语病的，问题是检验台的会是“大联指”开的，炮派人士自然少不了酸溜溜的感觉。他们要求出席检阅台并发表讲话的军管会副主任张子明回答：“八二三”是造反派，炮派是不是造反派？《风展红旗》这样记录张的妙答：

¹ 4月4日，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发表，正式吹响打倒刘少奇的全民运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正式成为刘少奇的代名词

“他们有个八·二三，你们有个九·一四嘛！”

炮兵团于是也找了个借口来“刷”自己的存在感：以纪念一·二六夺权3周年为名，也去检验台召开大会，主题也冠冕堂皇，切合实务：“打倒刘、邓、陶，万炮再轰省市委，血战到底誓师游行大会，”，时间是4月26日。经过数月历练，炮派觉得自己的力量已足以和823抗衡。不仅开会，还要别出心裁地搞火炬游行，反超“423大会”影响。

气势正盛的八二三当然容不得“敌手”长大。按《风展红旗》的观点，就是：这完全是在“向无产阶级革命派示威”，于是，“八·二三部份组织出于义愤。造了大会的反，冲了会场。”——这就是故事的全部。

关于“4·26事件”过程本身，两派当事人和亲历者都有详略不等的书面回忆可寻。直接带领同学冲击大会的昆明工学院学生刘光华的回忆记录最为清晰，虽成稿于事件发生50年后，我们依旧可从坦诚的文字中触摸到当年参加武斗的勇气、保卫“革命”信念的自豪，包括至今尚存的偏见。对于重现历史现场，我们不需另作撰写，直接摘录就够了：

自从炮派在全市贴出四月二十六日开大会通知后，全市的造反派不得了¹，纷纷涌到八派大联合指挥部和我兵团²，强烈要求阻止炮派开大会。兵团各办公室都挤满了人，我的办公室也是一拨接一拨地挤满了人。全市保皇派在积极准备火把之类的武斗工具，造反派在相互串联商讨如何阻止大会召开，全市躁动着。开始大联合指挥部和我们兵团也有顾虑，当时中央明确表态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但从没有表态两派都是造反派组织），正在强调两派大联合，怕违反中央大联合精神。但全市造反派要求强烈，特别是那些本身存在两派的单位（几乎是所有单位），反映尤为强烈，耽心如果张子明迫于压力也表态保皇派也是造反派，那今后造反派在单位上算什么？几乎所有各单位造反派都在谴责我们不下决心，提出如果你们头头不带头干，我们自己干。如果真

¹ 昆明地方土语：不高兴之意

² 指昆明工学院八二三兵团

是盲目地无组织地去冲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大联合指挥部的头头们，兵团的头头（包括我）都被群众围攻。有的人大叫：“右倾头头靠边站，他们不干我们干”，“只许造反派造反，不许保皇派翻天”。我们内心也很着急。直到四月二十六日下午三时，兵团在取得大联合指挥部的同意下，通知全校师生下午四点吃饭，五点集合，前往检阅台。其实所有师生都知道要干什么事情了。

这个决定，立即象电波一样传遍了昆明大街小巷，各单位的造反派早早地就扛着红旗，站在街两边等着了。五点钟，我兵团全体成员在宣传车的引领下，一路跑步向检阅台进发。等在街两边各单位的造反派自动跟在我兵团队伍后边前进。队伍到达南太桥，黄兆琪在宣传车上命令：“地质系保护宣传车，采选系上前行动”。我大喊一声：“上，全团人跟着我一路冲进会场，冲向主席台”。保皇派已经有五、六万人，他们开始是手挽手堵路，冲击和反冲击，队伍象波浪一样，一波一波地往前涌，行动缓慢。这时我后边的人喊：“团长，你从人头上跳进去，我们保证跟上”。此时我被抬着，从一层一层的人墙中丢进去。凡我到之处，大队伍都奋力跟着；凡我到之处都用双手扒开一条缝挤进去，大家也从人缝中快速插进去，象一把尖刀直插主席台。前锋突破，后续涌进，保皇派的会场开始混乱了。保皇派手中有木棒，因两边人员挤在一起，也无法施展。当我冲到主席台前时，碰到有一大排戴领章帽徽的军人（他们是军医学校和步兵学校的保皇派组织），占据着主席台前那片场地，当我冲到他们面前时，想向我动武，几秒钟从我后边跟进的人就把他们驱散了。造反派很快占领了主会场。此时我又喊上主席台，同学们用搭人梯的办法爬上三米多高的观礼台，又从观礼台冲上主席台。这时参加大会的保皇派大部已经开始逃离现场，包括大会的主持人李毅，方向东都逃得无影无踪。

在我兵团从西边冲击会场时，大联合指挥部负责人杨树先带领的工人造反派从会场东边杀入会场，把整个保守派队伍冲得七零八落，纷纷落荒而逃。

保皇派第一次召开大会，由于没有造反派的斗争精神和勇气，在受冲击的潮流面

前，手中有木棒无法使用，纷纷落荒而逃。广场上木棒丢了一大堆，遍地都有跑掉的鞋子，不少人是赤脚跑回家的（第二天据环卫工人讲，清扫广场时单鞋子就拉了两卡车）。昆明工学院学生、黄兆琪的智囊张培志证实，作为八二三的大本营，该校同学对炮派决定的过激反应确实太强烈，以至于谋事稳重的黄兆琪无论怎样试图加以劝阻都无济于事。4月26日上午，工学院还专门召开大会对此事进行辩论，结果是群情迸发，一致要求造反，黄最后不得不顺势而上，用现代流行语说，就是被“民意绑架”了。

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林超民先生的文本则基本上可代表炮派方面的历史记忆¹：

1967年4月24日，“毛泽东主义炮兵团”负责人方向东、周律型、李毅、周继文等人召集昆明地区造反派在云南大学召开串连会²。他们在会上提出三个“纲领”：1. “要把造反派联合起来，集中、火力打倒刘、邓、陶，再次猛攻省、市委，揪出党、政、军内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2. 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路线”，坚决团结支持革命领导干部站出来并肩战斗。3. 响应“拥军爱民”号召。参加串连会的造反派头头一致同意：4月26日在昆明市检阅台前召开“打倒刘、邓、陶，万炮再轰省、市委血战到底誓师大会”，庆祝夺权三周年。会后举行提灯游行。邀请昆明地区造反派组织参加大会。在主席台上给“八二三造反派”的主要领导代表安排重要席位，请“八二三”的主要负责人发言。“八二三造反派”得到消息后，即4月26日上午在昆明工学院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黄兆琪说“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召开大会是“收罗保守组织，公开制造分裂”，“老保向造反派示威”，决定由黄兆琪、杨树先等率领队伍冲击大会。下午，黄兆琪等到省军管会汇报，表示“坚决反对炮派开这个会，如果炮派一定要开会，就要去将会议冲散”。省军管会一位副主任也表示说：“炮派在检阅台开会是错误的，如果炮派一定要开会，发生一切问题由炮派自己负责。”汇报时在场的省军管会联络员和“省委机关无产阶级革命

¹ 林超民博客《血溅军医校》

² 会议于4月23日检验台大会次日召开，显然是对前一天八派大会成功举行的应激反应。

派联合总部”的“八派”头目安矩祥还怂恿说：“炮派的‘四二六’大会是制造分裂，收买‘保守’组织参加，不能让他们的大会开成”。汇报完后，黄兆琪与安矩祥等人在省军管会内与军管会的主要负责人研究，形成了冲击大会的行动方案。¹

1967年4月26日晚上八点，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组织十万人（号称二十万），在昆明市检阅台前召开“打倒刘、邓、陶，万炮再轰省市委，血战到底誓师大会”，庆祝造反派夺权三周年。会后举行火炬游行。4月26日一早，云南大学炮兵团和共产党宣言公社负责人周律型、周继文等人就控制了省长周兴、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将他们带到云南大学会泽院（当时更名为“红卫楼”）二楼云大党委小会议室，由中文系的红卫兵看守。参加大会的各单位造反派组织群众制作火炬。火炬的形式多种多样。大学生的大多是用木棍，顶端捆上柴火制成。有的则制作灯笼，内装蜡烛或煤油灯。工厂的工人则用钢筋、铁棍制成手柄，顶端捆上棉纱，将棉纱在柴油中浸泡一两个小时。1967年4月26日晚8时15分，“炮派”组织的万炮再轰省市委大会刚开始，“八二三”造反派的头头黄兆琪、安矩祥、杨树先等人率领“八派”团队，分别从东西两面冲击会场，并堵住“炮派”的退路。随后，“八派”冲击大会的团队越来越多，达到十多万人。二十多万人在东风争吵、冲撞。“八派”依仗人多势众，边冲边打，占领了主席台……炮派学生们见势不妙，大多如鸟兽散。只有工人坚持战斗。数万人的武斗在检阅台前的广场和东风路展开，混战中许多人被打伤。“炮派”点燃已准备好的火炬开始游行，火炬熊熊燃烧，照亮半边天。游行队伍宛如一条巨大的火龙。“八派”在火炬队的集中冲击下被迫让路。“炮派”的游行队伍沿途仍受到“八派”的堵截、冲击。八派、炮派双方的武斗延续到第二天凌晨。炮派有两百多人被打伤，送到各大医院救治。

不妨补充另一位炮派中相对更平和的亲历者对4.26事件的回忆：

¹ 林超民先生这段文字引自省党史办大事记第86页。原文如下：4月26日上午，“八派”得到消息后，即在昆明工学院策划，说大会是“收罗保守组织，公开制造分裂”，“老保向造反派示威”，决定由黄兆琪、杨树先等率领队伍冲击大会。下午，“八派”负责人到省军管会汇报，表示“坚决反对炮派开这个会，如果炮派一定要开会，就要去冲”。省军管会一位副主任也表示说：“炮派在检阅台开会是错误的，如果炮派一定要开会，发生一切问题由炮派自己负责。”

我以云南农大炮兵团驻昆明联络站负责人的身份，带着20多个同学参加了……兵团并没有通知要带火炬，要搞火炬游行。我们20多人除带语录本，几乎是空手去的。到了检阅台，七点多已经是人山人海，应当有上千人……我们在检阅台下，离主席台七八十米。等了一阵，大家说大会怎么老不开始，有人说请了八二三的战友，他们还没有到。人数多一点的单位有的组织念语录，有的组织唱歌。

大约七点半至八点左右，昆明工学院八二三兵团浩浩荡荡在南屏街与护国路交叉的地段出现了。打头的是一张广播车，声音很大，放着歌颂海军英雄麦贤得的歌曲——“葵花向太阳，战士心向党，麦贤得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这首歌从那天起成了八派的派歌）。广播车过了南太桥，进入广场，炮派群众自动让出了通道，并鼓掌欢迎。我们认为造反派战友来了！没想到，广播车带着八派的大队伍直冲到检阅台下，喇叭里传来了“不准老保开会”的谩骂声，其中，也听到了黄兆琪的江浙普通话。炮派的广播车及主席台上的李毅、方向东开始还在邀请、欢迎八二三战友参加批判会，无果，很快就转为了辩论，互相谩骂。从东边也有八二三的队伍冲进会场，八派群众在黄兆琪的指挥下，冲上主席台，占领了主席台，整个会场大乱。其间听到的都是辩论、谩骂，也有因用手指碰到对方发生吐口水、轻度的推搡厮打。两派上层进入辩论、交涉，我们由于离主席台远，只得等待观望。时而喊“打倒刘邓陶李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之类的口号，时而唱毛主席语录歌以及革命歌曲，而最打动人还是炮派的广播车播出“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引起了炮派群众的共鸣，炮派群众也跟着广播高唱（此后，这首歌成为炮派的派歌）。大约折腾了近一个小时，李毅、方向东在喇叭里发出了全体炮派战士撤离广场的命令，说因为八派的冲击，破坏了批判会，为了顾全大局，批判会改为游行。在炮派宣传车高吼的喇叭声引领下，我们喊着口号，唱着革命歌曲，很快退出了广场，经过护国路、金碧路、省委，从大观路、小西门，最后回到云大，此时已近十二点了。¹

¹ 摘自云南农学院炮派领袖杨崇龙与笔者通信。文革后杨曾任云南省教育厅长。

上述三种文本所言无大偏差，却明显能读出当年两派性质判别的明显“偏见”及不可掩饰的彼此仇恨。人类消解仇恨有两个办法，一是让时间慢慢冲刷，二是想办法消除偏见。第一法属于历史的任务，第二法当时则根本办不到。文革作为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实践的极致，其所需要，恰恰是不断制造对立和仇恨。诚如海涅所说，“基督宗教的爱所无能为力的事，可以考一种共同的仇恨去做到”¹。云南两大派的分野因“426事件”引发的带血仇恨，从此愈演愈烈。

第二天，两派宣传车一齐驶出，高音喇叭在长街陋巷喧嚣骂阵。八派说“四二六”是“大杂烩”，是“老保翻天玩鬼火”“鬼火游行”；炮派说八派打击革命造反派、破坏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是保护走资派的真正“保皇派”，数千“炮派”人还抬着事件中负伤人员游行示威，抗议八派的“野蛮暴行”“凶残举动”，游行沿途，两派再爆冲突……仿佛八二三火烟熏了蜂房，炮兵团的“马蜂”顷刻间倾巢而来，漫天里报仇。业已被政治狂热点燃的春城昆明，迎来一月夺权以来再一次骚动与混乱。亲历者说，每天入夜，昆明市中心的近日公园、工人文化宫、塘子巷、小西门等闹市街区，两派宣传车喇叭狂声对骂，观看听辩的学生、干部、工人、官兵和市民，凡数十万，甚至有从郊区大老远赶来的农民。

《风展红旗》载：

4月28日、29日、5月7日、13日，“炮派”与“八派”各自所属的群众组织之间又连续发生武斗，互有人员受伤。双方的争吵、辩论、磨擦、武斗，不断升级。

4月27日，街上出现“打倒八二三，活捉黄兆琪”“千刀万刮黄兆琪”“血洗工学院，踏平工学院”等大标语。

4月30日，云大炮头挑起民族学院同学和八·二三的矛盾。到处大叫大嚷：“八·二三打了少数民族同学”等触目惊心的大标语，印出大量传单，送往边疆，同时叫嚷“八二三打了华侨”“八二三打了支边青年”，挑起革命造反派与少数民族、华侨、支边青年之间所谓矛盾。

¹ 转引自（美）埃里克·雷弗《狂热分子：群众运动的圣经》第149页。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年版

5月6日，中午，部分支边人员游行，高喊“打倒八二三！”在走资派操纵下炮派所属某组织名义向下发了“紧急通令”煽动支边工人来昆明，准备八号在昆明召开五万支边人员控诉八二三大会，大会还要求交出黄兆琪，要求八二三公开向全省人民检查，会后还准备到工学院示威，妄图挑起更大规模的武斗。

5月7日，八二三造反派总部发出“告全市人民书”，揭发“紧急通令”的炮制者把上万支边人员煽动来昆的事实，揭露了八号大会企图挑起大规模武斗的目的和部署。炮派原部署的大会由于革命造反派的抵制和及时揭露而破产。

5月8日，云南军区政委张力雄在云大表态说：“云炮是坚定的左派组织”

5月11日晚，云炮召集四·二六那天人马开“打倒反革命两面派周兴”大会，约二、三万人，会场由一百多辆大卡车保卫。

五月十二日晚，云炮继续昨天的大会。出现“向支边人员学习”“坚决支持支边人员的革命行动”等大标语。

五月十三日深夜，机床厂“11.8”参加八·二三派“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打倒孙雨亭大会”后，回厂途经莲花池被“联指”¹及支边人员打伤多人。

五月二十一日，云炮和原新云南所属组织二千人，借批判《云南日报》为名，封闭了军管后的《云南日报》……

昆明武斗开始升级。

六、力量重组·角色转换·舆论战

客观地说，八二三在“426事件”上的失误实为无奈之举。面对炮派势力的日益膨胀，八二三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暴力弹压，干净利落将对方灭了，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使两派群众组织彻底决裂……从此，云南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武斗不断

¹ 联指，系昆明军医学校军队学员的炮派组织。位于莲花池附近的北校场。

升级，”¹八派可采取的第二种态度，就是静待闲观，眼睁睁看对立派坐大：这显然是办不到的。仇怨已结，斗争绝不会根本消弭，只可能暂时延期——如果那样，八二三将更加被动。八二三在“426事件”上的错误仅仅在于太缺乏政治素养和技巧（群众运动处于狂热之中，事实上根本无法谈及政治素养和技巧一说），他们只会迷失在偏见的雾霾里，以为胡乱一冲，便可毕其功于一役，从此天下太平。

结果当然正好相反。整个云南的事情都被此一冲变得更加麻烦。原来尚属晦明不定的局面，由此营垒鲜明，双方的矛盾变成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矛盾，而毛泽东教导“路线问题上绝没有妥协的余地”，事情当然再无余地回旋了。四月初，军管会挂牌，成立了一个“昆明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归口服务站”²这个昙花一现的机构至今在文档中鲜有踪迹可循，在官媒《云南日报》消息和文章中，我们至少知道既有八派的名人刘志宏、也有炮派的武斗之花冯庆波，此机构一成立，就组织了大型示威游行，“欢呼《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发表，批《修养》，把最大走资派拉下马”³，作为仲裁人的军管会从中周旋，还有一点“大联合”的景象，双方还能维持一个表面的和平，甚至八派在检阅台开大会纪念八二三，炮派还派出代表捧场。如今想维持这种脆弱的、虚伪的和平已不可得；其次，两派公开分道扬镳，大大加速了全社会群众和干部的分化。原先大批游走于中间，一派不得罪亦不亲近的骑墙派（特别是干部和历史上的“政治积极分子”），必须选边站队以求在派斗中有所依恃并得以自保。这种选择，除了理性判断，还包括模糊不清的情绪化取向，如批资反路线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式：受压就是左派；又比如普通市民的心理定式：总喜欢同情弱者，等等，这样，让对立双方的人数都得以病态膨胀（八二三不成功的第一次打击为对立阵营驱赶过去的人数则更多）；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426事件使炮派确认军管会是偏袒、支持823一派的，因此无权继续充当仲裁人的角色⁴。军人本

¹ 云南党史研究室《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纪实》第87页。

² 见《云南日报》1967年4月5日头条消息。

³ 见《云南日报》1967年4月8日头条消息。

⁴ 426次日，军管会出面召集两派群众组织负责人开会调解，张子明、王砚泉还明确批评“八派”负责人黄兆琪等“冲击大会是错误的”，炮派负责人则坚持认为省军管会处理“四二六”事件不公，偏袒八派，拒接参会。

非不食人间烟火的仙胎神人。炮派对军管会的抵触甚至仇恨，又加速了军管会对八派感情倾斜，使之更难保持仲裁者的不偏不倚。

相比仲裁身份缺位更大的麻烦的是，军队内部的矛盾（如昆明军区政委李成芳、副政委张子明、副司令鲁瑞林、省军区司令员黎锡福等支八者为一方，和省军区政委张力雄等支炮的另一方）因为群众的愈益对立也随之彻底公开。军队的错位使之对昆明局势从此失控，社会陷入更为严重的动乱中。

炮派确信自己迎来了“新造反时代”，他们通过 426 事件重新找到当初造反受压的感觉，只是现在角色转变了：军管会就是原来的“省市委”“工作组”，军管会的头儿，就是执行新资反路线的走资派；823 就是当初替走资派充当打手的保守派，而他们自己，再次变成了真正的造反派。至于许多参加炮派的原保守派人士，也第一次体验到了被压制的憋屈和造反的快感。兔子逼急了还会咬人呢。即使素来胆小怕事者，一旦遭遇压制，也会学学习反抗的。按照文革逻辑，这些受害者现在才应该是“左派”。

“新左派”们需要首先抢占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了。从 5 月 9 日开始到 6 月 15 日，昆明街头连续出现一批、共 14 篇署名“评论员”的文章，为炮派提供了极具煽动力的理论武器。“评论员文章”如下：

《集中火力向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道路当权派猛列烈开火》（5 月 9 日）

《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可忽视》（5 月 13 日）

《把云南的赵永夫揪出来》（5 月 17 日）

《毛主席路线必胜》（5 月 17 日）

《给来昆支边青年的一封信的要害是夺权》（5 月 18 日）

《千万不要忘记“枪杆子”和“印把子”》（5 月 20 日）

《彻底摧毁反革命的第二道防线》（5 月 20 日）

《在合法外衣的后面》（5 月 30 日）

《8502名指战员给炮兵团的公开信》（5月30日）

《云南政府向何处去》（6月1日）

《我们信任李成芳》（6月4日）

《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6月5日）

《评李成芳司令部》（6月5日）

《评欲盖弥彰的所谓公开信》（6月15日）

笔者搜集并阅读到其中能够找到的3个文本，以为文稿作者很有理论功底、政治谋略和文字功力，绝非一般学生能所为。文章从“516通知”精神起式，紧扣打击“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个主题，然后从回顾近一年来批判“阎红彦及其在军区、军分区内担任要职的狗党（如“秦大麻子”等人）的战斗历程触发人们的联想类比，提出：“回顾以往看现在，使我们不寒而栗，现在情况与66年9、10月份一对照，何等相似！”那时掌权的是省市委，现在党委和政府已经瘫痪，不掌权了，打击的对象显然就应该是新的“云南政府（按：指军管会）”，而“云南政府”的新当权派李成芳就是赵永夫！

文章继续挑逗人们的联想：“想当时，伴随八·二三掀起的轰轰烈烈的运动，是一场围剿南下串联同学及‘炮打司令部’这一革命口号的恶战：看现在，紧接着第二个八·二三（四·二三）掀起的高潮之后，是一场两大造反组织互相攻击和互相谩骂的混战。想当初，以阎红彦为首的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围剿镇压革命派不加制止，任其发展，暗中挑动，幕后操纵者借辩论之名，行围攻之实；看现在，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伙同云南军区、昆明军区内赵永夫式的人物，利用职权与‘合法’地位，对明明是两个造反组织进行的内部混战不加制止，不公开表态，而且，甚至明目张胆地拉一派打一派，履行着消灭炮兵团的反动计划，妄图把炮兵团一口吞掉，然后再把《八·二二》一举歼灭，好一个阴险毒辣的手段！”

作者利用类比完成了一个新的批判资反路线的故事脚本，加以重新演绎，只是角色转

化了：工作组变成了军管会、阎红彦变成了李成芳、“黑字兵”变成了八二三。在乱哄哄的革命年代，群众从来是不需要理性的，心理暗示是挑动集体无意识最有效的法器，再说，经过近一年的大动乱，这些群众本身已经养成了“造反”的嗜好，这种暗示的效果注定非常惊人。接着，评论员向“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际上就是军内、具体就是李成芳为首的军管会）”连砸4个排比句“你们敢吗”：

你们敢把你们在八。二三及炮兵团的所有讲话（包括公开的，秘密的，双方的，单方的讲话）统统公布于世吗？

你们敢把你们在军代表会上所有有关支左问题的讲话统统公布于世吗？

你们敢把你们所谓的支左言论统统公布于世吗？

你们敢把你们情况真实地向中央汇报吗？

然后咬定5个“正是”：

正是你们无视革命群众的正义要求，至今对武斗不出任何公告加以明文禁止，对于那些真正保守组织中的打人凶手不加任何处理。

正是你们把违法乱纪，镇压革命派，毒打革命派的责任统统摊到进行正面教育的连队干部和战士身上，竟然想把他们推出来作检查。

正是你们公然抗拒中央军委命令直到今年二月份还拒不撤回镇压革命群众的工作组。正是你们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包庇叛徒。应当强调指出的是：你们当中就有地地道道的大叛徒。

正是你们为阎红彦开追悼会，给连队同志传达闫政委被红卫兵打死了，闫政委牺牲了。

接下来质问6个“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一面说：“支持革命干部亮相，”另一方面又强迫革命干部检查支持

左派的“错误”，压制革命干部起来揭发问题。

为什么你们一面说：“支持炮轰省，市委”另一方面又扣下揭发省，市委的材料。

为什么你们一面说：“要禁止内战”，另一方面又说“这是一场大搏斗，不进行这场大搏斗，云南文化大革命就不能进行到底，这与大方向是不矛盾的。”

为什么你们一面说：“反对武斗，目前武斗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又说“现在是两个阶级的决战阶段，必然带来急风暴雨式的场面”，甚至提出“不打不相识”。这不明明在挑动武斗吗？为什么你们一面说“两派都坚决支持，你们是同甘苦共患难的战友”另一方面又说“炮兵团是一个革命派组织，我一直支持到群众认为你们是保守组织为止”。这不明明是在提倡内战吗？为什么你们一面支持炮兵团开会，另一方面又支持“八·二三”造反，你们不明明是两面三刀吗？

文章最后结论：“我们看你们不敢，因为你们根本不是真革命派，而是假革命派、两面派、反革命派。”文章果然大气磅礴，排山倒海，颇得中苏论战“九评”真传。

为了集中打击矛头始终对准军管会尤其“云南的赵永夫”，评论员还非常注意斗争策略，绝不触怒八二三，甚至做出帮忙喊冤叫屈的高姿态，确保公允和善意：“前一阶段他们利用八·二三小将的某些缺点，把八·二三小将打成反革命，对革命小将残酷镇压，无情打击。他们同时煽动其他群众对八·二三的不满，企图拉一派，打一派。特别明显的是利用部分炮兵团同志的宗派情绪，利用炮兵团部分同志把八·二三同志的错误看得过于严重的观点，挑动炮兵团部分同志去压制八·二三的同志。但是，我们应看到这是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玩弄的阴谋，应看到：‘错在战友，根在敌人’。”

事情的蹊跷之处在于，在云南文革史上影响如此巨大的系列文章，在时间过50多年后的今天，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均不知作者为谁？说党委宣传干部者有之，说南下学生者有之，曾任昆明军区文化部长的戈力在他的编著的《云南文革十年大事记》中，干脆咬定是赵建民背后捉刀，由“支持炮派的中上层干部组成的写作班子”所为。我们可以准确知

道的，仅仅是赵健民对这一组文章确实赞赏有加。“炮三师”机关报《炮三师》社评《破坏部队稳定就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四评赵健民向何处去》¹介绍“今年五月间，赵健民在他家里曾对原炮兵团负责人李木昆等同志说：‘评论员文章很好，很有质量’，又说‘去年的823揪出了一个阎红彦，今年的823要揪出一个军内的阎红彦。’真是一语道破真谛。

相反，八派文宣机构与此文先后出台、影响力和名气相若，而理论水准、文字功力相去甚远的大字报，其作者、其“罪行”，却荦荦在案，事后并以此为量刑依据，将作者判处徒刑13年，这份大字报题名：《触目惊心的五月兵变》

“兵变”一文署名“三镜观察员”，昆明工学院著名文宣小组，取名于《人民日报》社论《毛泽东思想是识别牛鬼蛇神的放大镜、照妖镜、显微镜》，由涂晓雷、刘浩、张培志²三人组成。就文论事，“兵变”一文与评论员文章确不在一个段位上，皆因工科学生做事讲求实际，搞文宣不求说理高深但求煽动实效，因而这篇文章的轰动效应不在评论员文章之下。

从当局对大字报作者涂晓雷的审判文书和官方史料披露的一些片段，该文意思大约有如下几层：一、云南是“西南是刘、邓的根据地”，故而敌情特别复杂，“是贺龙、彭真‘二月兵变’的战略后方”；二、导演“蓄谋已久的‘五月兵变’”的五人小组，正是支持炮派的云南军区政委张力雄、副政委李明、副司令员丁荣昌、朱家璧、王银山。他们才是“真正的赵永夫”；而走资派赵健民则是“伸向昆明军区的黑手”；三、军事政变的目的是夺军管会的权；四、文章言之凿凿地披露：“政变时间是5月29日晚11时后”。文章最后恶狠狠地号召革命群众“要高举起钢刀、利剑，向党、政、军内走资派的心脏猛烈刺去”。

¹ 1968年1月2日，《炮三师》第10期

² 笔者曾向被“三镜”另一成员张培志先生求证，张说“530电报”（见本章下一节）后，他即陪同黄兆琪一同赴京汇报情况，《兵变》一文的写作全然不知。直到6月26日康生接见云南两派代表后返昆，他和黄方知有此一文，张说他看过此文，感觉涂晓雷完全是在编故事唬人，故而颇易轰动，黄兆琪也觉得该文编得有些离谱。1970年代，笔者曾与涂晓雷在云南省委办公厅政策研究室共事多年，以为该文章与涂晓雷的为文风格与语言习惯非常契合。

1982年5月，与北京对“王、张、江、姚”的审判配套，云南也对本土的“小四人帮”黄兆琪、刘殷农、涂晓雷、胡延观进行审判并分别判处18年至1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其中黄、涂的“判决书”中都特别提到“‘八派’头目黄兆琪、涂晓雷等“为了尽快扭转这种不利局面，利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四点指示大造舆论，炮制了《云南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警惕真正的赵永夫要夺取军权》(赵永夫当时是青海省军区司令员，指控他下令开枪镇压西宁市的造反派而被中央撤职查办，粉碎“四人帮”后得到彻底平反)、《触目惊心的“五月兵变”》等蛊惑人心的造谣文章，到处广播，大量铅印散发，这批造谣诬陷的文章在干部群众中造成了严重混乱，加剧了军队、地方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使云南省军区的大批干部遭受打击迫害，长期蒙受不白之冤。”¹

一篇群众组织的文章有如此巨大威力，“使云南省军区的大批干部遭受打击迫害，长期蒙受不白之冤”实在有些夸大其词。此事不妨参看1967年6月26日康生和王力接见云南两派代表的讲话，所提及的“错误”文章，八派仅为《评战犯求和》，康称：“你们把炮团说成‘战犯’，这是不对的，你们应当勇于自我批评”，而点名炮派的，正是“炮团的几评（指“评论员”文章）”康称：“炮兵团也应该检查。”然后各打五十大板：“两方有些口号都不要，你揪我的赵永夫，我揪你的赵永夫，哪有这么多赵永夫？”。炮派记录的康生讲话全文约4000字²，亦未提到《触目惊心的五月兵变》。

为探求真相，笔者曾多方寻找《兵变》原文终不可得。正在绝望之际，不意从《孔夫子》旧书网上找到正在上网销售的《兵变》油印传单不甚明晰的照片，急忙下载并录为WORD格式再拼出原文。全文约8000字，全过程记录了“XX军区五人小组”“张永夫”“朱永夫”“丁永夫”³等人“紧密地结合蒋匪邦指示他的美蒋特务”“导演罪恶冒险活动”并最后遭到破产的全过程。比如“5月30日下午1点40分，XX号魔窟里开始的”“‘滴滴——达达，滴滴——达达’无线电译电员紧张地发完了由“朱永夫”签发的“五人小组向中央的电报”

¹ 云南省委党史办：《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纪实》第91页

² 八派的记录仅1400字

³ 代指云南军区政委张力雄、副司令朱家璧、丁荣昌

然后译电员如何擦汗，“张永夫”如何露出“狰狞的微笑”，接着如何对表，如何组织冲击人员昆明军区8号楼，等等。故事确实如好莱坞惊悚大片一般惊悚，只是故事情节的解决却处理得非常草率：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来了四点指示！消息像闪电一样很快传开。人们热泪盈眶，奔走相告。在这万分紧急、困难的时刻，是你老人家拯救了春城的危难，拨正了文化大革命的航向。这怎能不叫我千遍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鞭炮声声，锣鼓阵阵，驱走了黑暗，激励了红心 幸福的微笑迎来了黎明。春城八二三无产阶级革命派召开盛大集会，庆祝这战斗胜利的喜讯。人们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这时，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万道霞光洒遍大地。¹

现在通读此文，只觉得有点滑稽。诚如“三镜”写作组三人之一的张培智先生所言，涂晓雷就喜欢编故事唬人。1970年代笔者曾与涂共事多年，对他哗众取宠的为文风格也颇为熟认。无论从理论水准、政治谋略、文字功力来说，这显然都与《评论员文章》不在一个平台上，那么，为什么当时会产生如此轰动效应？笔者想起法国社会心理学大师，群体心理学创始人古斯塔夫·勒庞的一段话，用在这儿倒很贴切：

由于群众的极度敏感，因此他们的情感，无论好坏，都是夸张的。在革命年代，这种夸张尤为明显。一点微不足道的刺激便可促使群众做出可怖的行动。在平时就泛滥的轻信，到革命时期就变得越发不可收拾。**最为离奇的故事他们都相信是真的。**²

几十年后，《评论员文章》作者一直渺若黄鹤，而小小工科大学一年级学生涂晓雷却

¹ 《触目惊心的五月兵变》全文作附件载于本书末。

² 古斯塔夫·勒庞著《法国大革命与革命心理学》第60页

因为胡诌的一篇大字报而锒铛入狱，这又只能用斯大林那句名言来解释：“胜利者是不受责备的”¹。胜利者不受责备，失败者就必须承受所有后果，不管是罪有应得的，还是无中生有的，或者可有可无的“罪”。政治实用主义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无情。笔者亦设想，如果云南文革最后的胜利者不是炮派而是八派，站在审判台上的一定该是“评论员”文章的“影子武士”，想隐瞒也无法隐瞒，不管是他的名字还是写作过程。真若是，历史研究者一定就会少费许多周章。

七、528、529——又一个夸大其词的“惨案”

仇恨学家指出：与人关系紧张会有各种原因，但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你讨厌某个人（或某个团体），而不是产生讨厌的原因，无论挑起事端的是一方还是另一方，都并非因为看到了对方的缺陷并产生敌意，而是因为有了敌意而老看对方的错罪——虽然很难说这些真的就是错罪。八炮的矛盾发展到如今的程度，已经无是非对错之言，再说“伟大领袖”毛泽东教导过：“路线问题上绝无调和的余地”，根据这一最高指示，仇恨继续为云南文革的烈焰火上浇油。426事件仅仅一个月，又一场更为骇人听闻的武斗发生了。事件起因如后：

5月26日，昆明机床厂²炮派观点群众借庆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正式成立组织：该组织多党团员、老劳模、老工人，故而起名“五一兵团”，表示崇尚劳动之意，后被社会戏称“乌鸦兵团”。成立大会除邀请该厂附近炮派占优的昆明重机厂派员参会，还邀请位于北郊的昆明军区军医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宣传队为大会演出助兴³。晚会在机床厂露天广场举行。广场上摆好一排排木凳

¹ 1950年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所言。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

² 昆明机床厂原系抗战时期民国政府建立的“中央机器厂”，系大型企业，该厂位于昆明北郊茨坝，距城市20余公里。该厂造反派占优势，早就成立了“一一八战斗兵团”

³“联指”成员多为遵守纪律、服从领导的学员，不少人是班级干部或小组长，该组织与“炮派”挂钩。联指的对立派为“红色造反总部”（简称“红总”）多属于爱说爱闹、不守规矩、被领导视为“落后份子”者，他们军医校是最早起来造反的一拨人，与“八派”挂钩。

供观众入座。其时国人文化生活太贫，能看广场舞实为难得快事，本厂及四乡八里、厂矿单位、各色人均纷纷前来观看。据现场亲历者介绍，是夜所演，无非那年月流行节目，身着军装、臂带袖章的众男女在台上撸袖子跺脚，声嘶力竭地歌颂毛泽东、歌颂共产党“光荣、伟大、正确”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再加上恶狠狠高叫“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就罢他娘的官”一类，数千人台下静坐，每一节目毕，均报以疯狂掌声。熟料接着就出问题了：“下一个节目《火炬舞》”。全场灯光骤熄，演员每人手执蒙有红布的手电筒上场，随之舞姿蹁跹，黑暗中但见束束红光闪烁，高音喇叭配以画外音：“毛主席在井冈山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如今革命的火炬燃遍全国，燃向世界！帝修反和保皇小丑对此恨得要死，怕得要命……”

“426 大会”被冲流产，火炬已成为炮派的政治符号，它的出现显然是对八二三敏感政治神经的公然挑衅，是可忍孰不可忍？突然间，有人吹一响亮口哨，上百机床厂的八派工人冲上舞台便动手，他们抢过话筒吼道：“4·26 大杂烩，冲击它，就是对！”“我们不能容忍舞台上群魔乱舞、鬼火乱舞！”刹那间，舞台灯光全部开亮，更多人冲上台夺手电。炮派演员亦非省油灯，一副为宣传毛思想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之概，边抵抗边演，直到一个个被打翻在地。“5·1 兵团”眼见得客人被打，岂能袖手旁观？亦纷纷上台，和八派全武行混战。台下两派亦然，或扭打、或漫骂、或辩论、或东奔西逃，整个广场哭声、骂声、惨叫声、呼爹唤娘、呼儿唤女之声一片，好生热闹。

当时，由于昆明重机厂炮派去的人多，再加之还有昆明军医学校和昆明步兵学校近 300 名炮派军人，“118”没占到多少便宜，于是星夜派人进城求援，次日凌晨，昆工学院 200 余人率先赶到，继而城内八派上万人陆续闻讯驰援，省军管会得悉，即派执勤部队前往隔离，将军医校“联指”受伤人员 20 余送医救治，其余军校学员一看阵势不对，顺着长虫山脚匆匆跑北校场军医校休息并避祸去了。

吃了亏的军医校“联指”休整 1 天，于 28 日上午，在校内召开声讨大会泄愤，并向该校“红总”（八派观点）挑衅，打伤多人。“红总”吃了亏，照例派人求援。时逢周日，

各单位无法集中，823的单兵个人得闻消息，三五成群纷纷涌去軍医校凑热闹，到上午十时，已有上千好事者如潮涌来。“联指”见势不妙，抢先占据校园内与总参三局培训基地共用的大礼堂以为据点，坚守不出，同时派人向各单位炮派求援。823人多势众，将礼堂围个水泄不通，大呼“联指”交出打人凶手和策划者。“联指”据守不出，包围者亦围而不攻，局面持续到29日下午三时左右。其间，分管軍管会制止武斗领导小组负责人的鲁瑞林等带领徒手连前去实施隔离，亦收效甚微。

昆工围攻人员领队刘光华介绍了如下细节：5月29日上午九时许，軍管会副主任张子明找到他，说是从28日晚就来此调解，实在太困，体力已有不支，“我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刘遂“把他带回工学院学生宿舍睡我的床上。张子明太疲倦了，他鞋子也不脱，就躺到我的舖上，鞋底的泥土也带上床。我不客气地说：你再累也得把鞋脱掉嘛。他只好坐起来脱掉鞋又睡下去。我告诉他：‘你睡着我把门锁上，下午两点我给你开门。’锁上门我又回到北教场。下午两点，我回校开了宿舍门，张子明说：‘刘同学，谢谢你，我要回軍管会了’”。¹

此事虽小，却可读出三点信息：一，軍管会被群众纠纷闹得确实够辛苦；二、作为軍管会现场指挥人员临阵溜号睡觉，所谓“调解”，实在有点虚应故事；三，軍管会和823关系看来蛮不错。

关于事情的解决，刘光华的回忆版本如下：八派久围不撤，被围礼堂的“联指”不交“凶手”也出不来，时间已过近整两天，早已饥渴难忍，四时左右，遂撤砸礼堂条椅，手执木条实施突围。执勤部队见礼堂里的凶汉挥木条冲出，深恐双方械斗，乃以最快速度对突围者实施包围。三方人员于是形成三道同心圆：中心为军校学员、外层为823，两圆之间是实施隔离的执勤部队，三圆僵持不动。刘光华称，执勤部队负责人“找我商量，统一的意见是：由执勤部队护送‘联指’人员带进昆工，交由兵团处理”“我给在场八派人员讲了这个意见后，出于大家对我们兵团的信任，都同意了”“于是，由执勤部队监护着，

¹ 刘光华回忆录《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实践和官僚集团的反攻倒算》

我让‘联指’人员排成五路纵队，八派人员又在‘联指’人员两边各排五路纵队，沿公路向工学院进发。”为避免冲突，“我命令‘联指’的人在行进中各人揪着自己的耳朵，‘联指’的人也照办了。”“‘联指’人员被安排进学校四号楼几间教室内。我组织了临时小组守住四号楼接口，任何人不准出入，同时给‘联指’人员送进足够的饭菜。执勤部队见我这样安排后，也撤走了。”刘称，“按大联合指挥部要求，要尽快查明打人凶手，其他人尽快放掉……晚饭后我向全体‘联指’人员宣布：只要认错，写个检讨，哪怕一句话，只要有认错的内容，即可离开工学院……当晚十时，‘联指’全部女学员和部分男学员都离开了学校。我怕放人受阻，每放一个人都安排专人送出大校外。第二天用同样的方法继续放人。到下午3时，只剩下5个既不认错，也不写条子，但又无法认定是否打人凶手……”五点左右，军管会开来一辆大卡车，由三个军人把他们带走了事。刘光华说：“闹得沸沸扬扬的‘五二八’、‘五二九’事件就结束了。”

如果就发生在机床厂和军校的武斗事件而言，事情并非多么血腥，既没死人，也无伤残，皆因有426前置铺垫，双方动员的规模更大，因而影响就更大罢了。事实是：就整个事件而言，刘先生所说打斗事件结束，其实才仅仅是事件的开始。

首先，对528、529的事实认定上，相关版本就相去甚远。官方版本的表述是：

5月28日上午，昆明步兵学校“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和地方的其他“炮派”组织约1000多人，到军医学校向被打伤的“联指”人员表示慰问。下午，“联指”在学校操场上召开声讨“红总”罪行大会，邀请了步兵学校的“革联”参加，大会进行中又受到校外“八派”配合“红总”的冲击。大会在操场上无法进行，只得转移到礼堂进行，“红总”又围住礼堂与“联指”对骂，扔石块砖头，打碎窗子玻璃，攻守双方发生激烈的对抗。地方的“八派”经串连发动，约3万多人前往军医学校支援，把礼堂层层围住，黄兆琪亲临现场指挥。“联指”群众困守礼堂，被包围了一夜。5月29日天刚亮，“八派”开始向“联指”发起总攻，一些人爬上礼

堂房顶揭开顶瓦，往下撒石灰、农药“六六六”粉，投掷瓦片，一些人用电线杆冲击礼堂的门窗。礼堂大门被撞开后，“八派”人员蜂拥而入，双方发生了一场混战，共约100多人受重伤。“联指”寡不敌众，一些人被“八派”抓到昆明工学院非法关押，并由“八派”组织“政法兵团”私设公堂进行非法审讯。

云南大学历史系67届学生林超民在记录此事的博文“血溅军医校”如是描述：

5月28日上午，昆明步兵学校“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和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等院校、厂矿“炮派”组织约2000多人，到军医学校声援慰问被打伤的“联指”人员。下午，“联指”在学校操场上召开声讨“红总”罪行大会，邀请了步兵学校的“革联”参加。大会进行中，校外“八派”配合“红总”的冲击大会。他们高呼：“不许老保翻天”！“造反有理，保皇有罪！”等口号。搅乱会场。

大会无法在操场上进行，转移到学校礼堂继续开会。“红总”将礼堂团团围住。与“联指”对骂，扔石块砖头，打碎窗子玻璃，攻守双方发生激烈的对抗。地方的“八派”经串连发动，约3万多人前往军医学校支援，把礼堂层层围住。黄兆琪亲临现场指挥。通过高音喇叭向礼堂内的群众发出限令第二天七点前向造反派即八派投降。“联指”群众拒绝投降，被围困在礼堂整整一夜。

5月29日晨7时，最后通牒时限已到，黄兆琪下达总攻击令，随着一阵凄厉的军号声，八派发起冲击，一些人爬上礼堂房顶揭开顶瓦，往下撒石灰、农药“六六六”粉，投掷瓦片，一些人用电线杆冲击礼堂的门窗。礼堂大门被撞开后，“八派”人员蜂拥而入，见人就打，棍棒声与惨叫声震天动地，到处散落着鞋子、帽子、书包。被打伤的人仰天惨叫，被打晕的人伏地翻滚。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搏斗，八派制服了“联指”的学员、炮派的学生、工人。勒令所有“俘虏”双手抱头，将他们押解到昆明工学院四号楼，囚禁在教室里。被关押的人数不下 3000。

笔者为此询问林教授博文史料出处，他说非现场亲历，多摘自传单和小报，在博客发文仅作征求意见之用。为此笔者再参阅其他亲历者回忆并走访相关人士，以为上文所言实际多为事发当时一种情绪化讹传，如“最后通牒时限”“黄兆琪下达总攻击令”“凄厉的军号声”等，昆工八派想要久围长困，饥饿炮派其体肤的战法则有之，黄兆琪亲自指挥该次武斗则无依据；又如揭房瓦、撒石灰、撒“六六”粉、投掷瓦片甚至抱电线杆冲击礼堂门窗，还有“棍棒声与惨叫声震天动地”“被打伤的人仰天惨叫，被打晕的人伏地翻滚。”则近乎夸张。笔者再向就读于军医校的学员王洪波先生求证，他说总参情报部三局礼堂属弧形拱顶整体现浇结构，无瓦可揭，凿孔极难，何来撒石灰、掷瓦片、撒“六六”粉之处？俘虏 3000 显然也是夸大了的数字。同为云南大学学生的杜德威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里写及此事也认为“俘虏”炮派为 200 余人，“包括我班的李君等 10 余个同学在内”。另一亲历者、云南农林学院学生领袖之一杨崇龙的回忆是：

5.29 下午，我赶到北校场昆明军区卫校门外，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看热闹，围观者很多，到了一定距离就进不去了。等了一会儿，正好看到了八派数百人押着炮派数十人出来。当时没有枪，但有棍棒。炮派“俘虏”衣冠不整，看得出是发生过厮打。炮派“俘虏”不是“揪着自己的耳朵”，而是抱着头，如同犯人押着出来。后来据说是学古巴押入侵的雇佣者俘虏的做法。

如果和以后发生的热兵器武斗相比，发生在军医校的武斗实在只能属于“前冷兵器时代”的“小儿科”而已，以肢体冲突为主，充其量再辅以棍棒械斗之类。事虽如此，其事件的外延却非常激烈夸张。八派一再冲击、捣乱炮派集会，已经壮大了的炮派绝对不会就此认怂，就在八派抓获批量俘虏的当儿，发生了昆明文革中又一件戏剧性事件。

八二三二号头目刘殷农听闻北校场事态严重，旋与另一大佬金彝旦（云南煤矿机器厂八头）一同骑自行车从指挥部（巡津街）往事发现场赶，已是黄昏，“三家巷”一带已被云南大学等炮派人员封路，刘与金躲在路边商量对策，一辆军用吉普恰被拦下，车上跳下军队某首长秘书，刘殷农认识的，刘欲搭车离开，对方已认出刘并直呼其名，拦车人一听“刘殷农”，顿时一拥而上将其抓获，金彝旦亦暴露了身份，随之也被抓进大院。为安全计，炮派立马将刘、金二人转东郊菊花村一荒野仓库，后又解上一辆小卡，由5个人连夜押解离滇，暂于贵州省物资局某公司关押，声称二人系“参加、策划武斗的坏人、坏分子，因涉及到省委的一个大案，要对其进行严格的审查，昆明很乱，所以才紧急送到贵阳。”云大炮头方向东于第一时间，在校篮球场上用麦克风向大家发布了刘、金被擒消息。云大学生为之雀跃。

大佬被抓且去向不明，八二三大哗，一场营救活动——与其说营救——不如说是一场舆论造势立即高规格展开。最出彩者，为省话剧团饰演过孙中山的英俊小生邓跃泽，模仿马雅可夫斯基风格，写出煽情梯格长诗《刘殷农你在哪里？》，长诗大打悲情牌，一咏三叹：

刘殷农

你在哪里？

你的战友

在呼唤你……

诗作者与女演员江小梅一道朗诵录音，字正腔圆，句句含情，在百货大楼广播站反复播放，听得八二三听众恨不得马上找炮派拼命。明明八派惹事，好像自己反倒吃了大亏。

真正被挨打的炮派当然不会放过反击机会，五月二十九日晚，炮派全城的高音喇叭一齐出动，大呼“昆明工学院私设黑监狱，残酷迫害红炮手”扬言要“血洗工学院，活捉黄兆琪”还要“枪毙张子明”等等。炮派又在西站号称结集几万人，以省交通厅系统后来的武

斗之花“前哨”兵团和“援越抗美”兵团¹为主力，准备对工学院进行冲击。昆明市内各单位 823 组织亦集结昆工实施保卫，人数达三万余，学校四周的防空沟、防空洞（1964 年为防美国飞机从越南起飞空袭昆明之用），教室人满为患，形势异常紧张。

炮派认定，如果不是得到昆明军区政委李成芳一千人等支持，八派决不敢一而再、再而三寻衅滋事，必须追根溯源找军队算账。5 月 29 日下午，“炮派”数万人开到昆明军区大门口静坐，要求军区严惩打人凶手，有年初围攻军区逼索阎红彦的经验，这一次炮派学乖了，他们不进军区大院，就在大院门口静坐。门外丁字形两条交叉直道：金碧路和国防路被示威者坐得满满，交通完全中断。炮派还调来宣传车，车顶四角的高音喇叭直对军区大楼狂呼怒喝：“严惩‘五·二八’、‘五·二九’肇事者！”“还我红炮手！”“李成芳挑动‘八·二三’镇压红炮手罪责难逃！”“枪毙张子明！”等各色口号，并克隆半年前对付阎红彦成例，要求李成芳出来与群众见面回答问题。那个影子武士“评论员”马上跟着凑火扇风，静坐第三天，6 月 1 日发表文章《云南政府向何处去？》称“震动全省的‘五二八’、‘五二九’惨案，不是什么偶然事件，是李成芳、张子明重蹈刘、邓复辙，全面进行反扑，实现反革命复仇的总暴露，是李、张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必然结果”，“如果云南政府支持无产阶级专政的话，就应该制止武斗”，并断言“庆父不死，鲁难未已”，“钻进现政权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除，武斗和内战就不会平息，这个真理难道现在还不明白吗？”

马路当心则放一桌椅、一话筒，专供事件受害人进行血泪控拆。控诉者众，而让人印象最深者则为一位年近 50 的军人。他自报家门称乃昆明部队某医院军医。控诉泣不成声，说他亲眼所见，八派“暴徒”如何将抓到的炮派“俘虏”们“挖掉眼珠、掏出心肝”，如何“把死尸送到昆明东郊的跑马山火化场”“另有一些尸体则被捆上大石投进滇池，”“许多可亲可爱的炮派兄弟姐妹们就这样不留痕迹地给毁尸灭迹了……”现场听讲的云大杜德

¹ (这是一支在援越战争中组建的工役制部队，关于这只武斗队伍的来历，后面还有重点介绍

威同学说“在场的人们悲愤到了极点！我们在下面一边听一边流泪。”附带说明，因为军医煽情过头，以至于杜同学“怀疑这‘老军医’其实是境外派遣来的一名特务！只有那类角色才能干出那种无中生有而煽动性极大的勾当来。”再后来“划线站队”，当局指责炮派在文革中执行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的反军乱军计划，“我内心也不得不半信半疑。”

1

就在老军医声泪俱下控诉后的第二天中午，恰恰有一辆往跑马山火葬场方向驶去的中型吉普被炮派堵获。车上载3具尸体：两具年轻男尸和一具中年女尸，驾驶员乘乱溜掉，堵截人员认定3具尸体正是八派送去火化以销毁罪证的战友尸体，马上运至省军管会呈堂。三具死尸面呈菜绿色，散弥腐臭之气。五六月之交是昆明最为炎热时节，其味让人闻之欲呕。社会秩序本已混乱，省军管会一时也无法查清车辆属何单位，更弄不清楚死者是谁？死因为何？运尸车一直摆在军管会大院，直到几天后尸体流出臭水来，炮派才不得不同意省军管会让人把车子弄走了事。

静坐整整坚持了7天，其间故事定然多多，（八派乘机编造一则“女炮人哭尸”故事调侃，说示威者高薪诚聘某农村专业哭丧妇现场表演哭尸，最后哭错了对象，云云）。

古人云：哀兵必胜。意赞悲愤者往往有拼死一搏之大勇。炮派静坐七日，八派果然鲜有前去挑衅者，只有一次开宣传车前去用高音喇叭骂阵，说炮派“反军乱军、毁我长城”诸语，被炮众上前将其喇叭砸个稀巴烂。余下时间，悲伤无度的静坐者都坐在马路上静听宣传车播《红军战士想念毛主席》并跟随哼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他们多么希望伟大领袖能了解此时此刻炮派的艰难困苦！此曲旋律婉约，如泣如诉，哀怨绵绵，自此后竟成为炮派的派歌，大喇叭只要一放，大家就知道有情况：或要开会鼓动了，或有人挑衅了，或要主动出击打架了……与八二三以歌唱麦贤德²的“葵花向太阳，嘿！战士心向党……”之激越派歌相比，端得个凸显了工科大学生的赳赳武人气与文科大学生的

¹ 见杜德威回忆录《文革风云映滇池》

² 文革前大陆与台湾在海战中受重伤仍坚持战斗的英雄

温婉文弱质之对比鲜明。

歌曲虽不激越，炮派的心思是很明确的：一是“坚决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二是“坚决揪出云南的赵永夫式人物”，三是“揭开云南军队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简单说，就是如当初揪阎红彦一样，要把李成芳揪出来。

昆明军区可比当初的省委沉得住气。因为炮派静坐行动开始第二天，北京便致电昆明军区党委。云南文革史简称此电为“中央530电报”，电报全文如下：

中央和军委对昆明地区两大派“八·二三”和“炮兵团”发生严重武斗，军区机关、部队干部战士引起思想上动荡，极为关切，要求军区党委、军区机关、部队全体同志切实执行以下各点：

（一）对昆明地区两大派的武斗，军区机关、部队干部战士都不要介入，应该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制止武斗，劝说群众摆事实讲道理，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逐步解决两派之间的问题，不要打击一方压制一方，使矛盾激化。

（二）昆明军区处在反帝斗争的第一线，担负着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援越抗美，保卫国防等艰巨任务。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关于重申军区文化大革命分期分批进行的指示中，规定昆明军区文化大革命暂缓进行，望坚决执行这一规定，机关、部队一律不开展“四大”，任何人都不得揪斗领导干部，保持机关、部队的稳定，院校、文体单位不得同机关、部队串连，一律回到本单位，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三）中央军委信任以李成芳同志为首的军区党委，军区机关，部队全体同志要在李成芳同志为首的军区党委领导下，加强团结，坚守岗位，遵守纪律，努力工作，很好地完成中央、军委所赋予的“三支两军”，支援越南，保卫国防等一切任务。

（四）对军区副政委张子明，胡荣贵的历史问题，由军委总政治部进行调查，尔后在进行实事求是的处理。

电文最要命的一句就是“中央军委信任以李成芳同志为首的军区党委”，等同授李成芳

以“尚方宝剑”，与1月份那个已无依无靠的闫氏悲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至于调查“支八”的张子明、胡荣贵历史问题，表面上满足了炮派胃口，其实不过将二人送别处避祸罢了¹。任你炮团在军区门口乌烟瘴气闹得震天价响，李成芳只管高挂免战牌，稳坐钓鱼船。直到静坐第七天，军区大院内的高音喇叭这才响了，一本正经又不厌其烦地广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发布的“六六通令”²。强调要维护文革秩序，“严禁武斗，严禁行凶打人，严禁在本单位和到外单位打群架，”“社会主义国家的财产和集体财产绝对不可侵犯……”等，而且以上各条，“由各地卫成部队和驻军负责保证上述各条的执行，自即日起对于违犯上述各条的，都应严加处理。对于肇事者和背后挑动者，对于打死和打伤人的凶手，卫成部队和当地驻军有权逮捕和拘留”云云，静坐人等有点扛不住了，6月8日晚上11时许，李成芳终于现身，军区政委并无赳赳武夫护驾，前呼后拥者全是白衣天使，扶的扶，搀的搀，个子高大的李政委亦非平素威仪凛凛，而故作病殃殃有气无力状，手上还挂一输液瓶。军医首先在麦克风前向众人交代，说政委疾患正发，血压畸高，只能和大家讲几分钟的话，云云。亲历现场的杜德威回忆，大家感觉李成芳好像根本没病，不过故意装一副病夫模样出来应付罢了，众人却又无可奈何。现代政治学鼻祖马基雅维利指出，君主（泛指政客）“如果总是善良，就要灭亡”“在守信有好处时，君主应当守信，否则不要守信。君主有时候必须不讲信义”³看来军人也一样。

李成芳发表了简短讲话，大意为：关于5·28、5·29事件，省军管会将组成调查组认真调查、严肃处理。昆明军区负有边防重任，又是援越抗美前哨，现在中共中央已有“六六通令”，希望大家迅速返回各自单位，维护文革正常秩序和军区的正常工作开展，云云。一位不依不饶的炮派女广播员通过高音喇叭厉声喝问：请李成芳表态，炮派广大群众激于

¹ 胡荣贵销声匿迹。胡荣贵和秦基伟、李成芳、张子明、张力雄、王蕴瑞被送到一个农场劳动，后送到湖南364医院休息。1973年，秦基伟、李成芳、张力雄、王蕴瑞去北京，胡荣贵和张子明回云南。

² 即1967年6月6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发布的“中发（67）178号文件”，文件称：“为了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秩序，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保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民主，，保护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正常进行，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防止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混水摸鱼，趁机捣乱，特发以下通令”

³ 转引自罗素《西方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52页

义愤，围坐昆明军区门前要求解决问题的做法是不是革命行动？李成芳只是个气喘吁吁，道是大家的心情和做法可以理解，可以理解。静坐炮众紧追不舍，李成芳被纠缠不过，只好表态是“革命行动”，然后，由医护人员将其护送返回大院而去。

李成芳的表态总算给势成骑虎的芸芸炮众搭了一个下台阶梯，次日中午，炮派指挥部宣布，此次围困昆明军区的静坐示威活动胜利结束！各组织立即按秩序撤回单位。

紧接着，由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兼省军管会副主任鲁瑞林任组长的“5·29”事件调查组正式成立，调查组由两派各出3成员组成，调查组办公室设在春城饭店客房，订立工作纪律、工作制度、工作计划并确认应当重点调查的地方和单位等，还配小车一辆，成员每天发给伙食补贴。鲁副司令发表讲话，与调查组成员一一握手，鼓励大家要同心协力，善始善终搞好这项工作。鲁是被炮派最为诟病的“铁八”，而“528”“529”本来就没有什么可调查的，走走过场而已。果然，混了两个月时间，大家都知道闹得沸沸扬扬的“惨案”，受伤者不少，人却一个没死，至于下落不明的失联者，实际是乘乱回老家躲了起来，后来均纷纷现身。于是鲁组长宣布调查组“暂时停止工作”，实际也就解散了。忙乱二月，唯一的好处是：调查组的穷学生好歹捞到一小笔补助费，也算皆大欢喜。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被同样炒作得沸沸汤汤的“刘殷农绑架案”，很快也证明有惊无险。刘、金二人被绑贵阳后，很快凭其过人机智，瞒过劫持者取得当地人帮助，并到军分区通过军线与昆明军区取得联系，最后由部队护送二人取道成都直飞北京，与在京等待中央领导人接见的黄兆琪等会合，6月26日接受接见后，又一同飞返昆明。到达当日已近午夜，黄、刘一行被直接从机场接到省体育场，场上站满等候的人群。这一夜，刘成了绝对主角。黄兆琪代表八派指挥部讲一段话后，点名刘殷农讲话，这时，满场八众齐声模仿邓跃泽和江小梅的普通话高呼：“刘殷农你在哪里？你的战友在呼唤你！”刘顿时热泪盈眶，激动回应：“在你们的呼唤下，我毫发无损地回来了，让我们响应中央首长的号召，高举革命的大联合旗帜，为筹建云南省革命委员会而努力吧！”

作为本节的末尾，必须说一说6月26日康生、谢富治和王力在人民大会堂南会议厅对云南两派赴京告状代表的接见。告状主题自然是“528、529”，诉求自然是想最高当局断明是非。他们自然不会想到，在这几个权倾天下的大人物看来，与全国烽烟四处的乱局相比，“528、529”那点儿馊事儿实在不足挂齿。一个月前的5月6日，云南邻省的成都产业军已经真枪实弹向造反派实施射击，死54人，伤2000多¹；接着，6月5日，重庆又发生了八一五派对西南师范学院“春雷”的万人大救援和反到底派紧接对八一五实施的施家梁伏击围歼；6月6日，长沙“六号门”血洗了中苏友好大楼“高司”宣传站²、6月17日，武汉“百万雄师”与造反派六渡桥钢钎斧头厮杀，据不完全统计，“造反派和群众重伤121人多人、死24人。抢回的尸体个个都有几十处穿透性的伤痕”³。连诗人白桦也憋不住怒吼着想去拼命：“放开我吧，妈妈！”……任何一个都比昆明北校场事件规模大得多且血腥得多。边疆就是边疆，北校场那点儿鸡毛蒜皮也要跑到北京来，给日理万机的中央添乱，真是的！

康生做了六点指示：“第一，大字报不要上街，第二，双方不要打、砸、抢，第三，双方要保证铁路、公路、桥梁、涵洞不受损害，第四，双方不要抓人，第五，双方不要组织农民进城，第六，无论如何不要动用枪支。”

总而言之，“大家好好学学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央的意见希望你们在中央的方针下，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实现大联合。有不同意见可以经过摆事实讲道理，平心静气交换意见。”“回去要做保守派的，中间派的工作，这种做叫和稀泥、折中主义吗？不是，这是毛主席要求这样去做，炮兵团作这样的工作，应该说不是一个错误。相反，八·二三你们这方面做得少了。应该去做，应该向炮兵团学习。”“八·二三有好的意见，炮兵团要听取，要尊重解放军，不要因为解放军犯了错误，就动摇了。对解放军，不管犯有多大错误，要慎重”“你揪你的赵永夫，我揪我的赵永夫，哪有这么多

¹ 王锐：“‘文革’成都‘五·六’事件始末”，载《四川当代史资料》

² 见陈益南湖南文革回忆录《青春无痕》

³ 徐海亮：“1967年春夏的武汉，问题的由来与发展”

赵永夫？”¹

面对这些喜欢大惊小怪的边地土人，康、谢、王照例一顿哄、一顿克，让后把他们打发回家了事。至于那些非常神圣的、为了保卫最高领袖毛泽东而打得你死我活的“惨案”，在北京看来，简直是些无厘头胡闹。上万人，整整七天不舍昼夜，仰望北斗星，巴望得到伟大领袖关注他们的涕泗涟涟、无限哀怨，谢富治对此就给出一句话评价：

天那么热，坐干什么？在家里学毛著多好。

第三章 钦差大臣失败的昆明之行

八、1967年的夏季形势

毛泽东发动文革已近一年。按他的预设，1967年底就可以结束了。毛泽东审定的1967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题目就叫“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号召夺权后，毛泽东又说，今年2、3、4月看出眉目，明年这个时候看出结果，或更长一点时间”²，所谓“2、3、4月看出眉目”，其意就是在2、3、4月建立省、市、自治区的革委会³，接下来就文革收官。

现实情况偏偏是，整个局面已势成狂车陡坡，无法控驭，到1967年6月，除了北京亲自抓的上海和北京革委会，全国也就黑龙江、山东、山西、贵州⁴，仅6个，其余全部一团乱麻。二月份老帅怀仁堂一闹，毛泽东不得不又来反“复辟逆流”。军队介入地方，近80%的军人都支持右派（保守派）镇压左派（造反派）；后来军队领命转向，被镇压的左派（如四川的826、湖南的“湘江风雷”等）咸鱼翻身，造起反来更是血仇亡命——他们的仇家已不仅是镇压他们的军队，还包括躲过镇压

¹参看“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康生王力接见云南两派代表的讲话”。记录稿有两个版本。炮派版本载于《九一四战报》第二十三期（1967年7月7日）八派版本载于《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炮版4000余字，八版仅1000余字，显然有各取所需之嫌。

² 周恩来1967年4月18日在广东群众组织代表和驻军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王年一 P222）

³ 实际情况是，到了1967年底，才成立了9个，还有20个没有成立

⁴山西、黑龙江革委会也是在北京的直接操控下成立的。

甚至暗中自觉不自觉地帮助镇压他们的左派（如四川“红成”、湖南“高司”）。至于趁造反派被镇压而东山再起的保守派（如武汉的“百万雄师”），他们与左派更是新仇旧恨一齐迸发……各种政治势力剑拔弩张，对立愈益尖锐，“大联合”成一纸空文。其次，干部在第一波打击之后，终于缓过气，也大体搞清楚毛泽东想要干什么了，于是开始在群众组织间选边站队，充任幕后军师：“三结合”亦遥遥无期。旧矛盾未了，新矛盾又起，革委会几成水月镜花。

毛泽东对乱局的治法依旧抓点带面。于是在6月27日，钦派谢富治、王力来昆明抓一个“就地解决问题”的点。云南是谢富治的老窝，自打共产党政权主滇至1959年调离，谢一直在此担任高管，派他来此解决问题显然诸多方便。按谢的说法就是：“全国将近三十个单位，如果再加上某些大城市，就将近四十个单位，都要拿到北京去解决，那得要多少力量？而且不是一次就可以解决问题的。现在全国只有六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也要拿到北京来呀！最近山西就到了北京嘛！恐怕黑龙江还是要到北京来的。”¹以此做铺垫，毛紧接又御驾武汉，直接抓点，也是要“就地解决问题”，结果偏偏闹出一个震动全国的720事件。此事件多有文革史家专题论述，兹不赘言。还是来看云南。

以李成芳为首的昆明军区支持的确属造反派，这没问题。问题是事情一开始，心理倾向就朝向了“老八”。本来——两派相比，八二三势力确实大占优势，炮派人少，且在阎红彦自杀后撤出军区的问题上和八派闹翻脸，惹得周恩来不高兴，相反，周总理对八头黄兆琪、刘殷农偏偏青睐有加——军区喜欢八二三事出有据。问题在于，早熟的草民领袖一沾上“热气”就喜欢“唯我独左”，喜欢“老子天下第一”，于是先来一个“426”，接着又来一个“528、529”，结果是敌手未灭，倒是“为渊驱鱼”，帮助炮派势力大增。这些赶进炮派渊池的“鱼”，除了大批刚刚垮台散伙的保守派群众，最要命的是一批老干部。“老家伙”懂政治内情，有斗争

¹ 1967年7月2日在昆明部队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凤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

经验，一旦介入派斗，力量平衡便出现更多变数。特别那位敢作敢为的山东好汉、中央候补委员、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一旦乱世出山，注定会闹出许多大动静。

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在他的回忆录《西南三十年》中有一段详细记忆：“大约6月上旬的一天，昆明街头出现了‘打倒叛徒李成芳’的大标语。我得知这个情况后，感到惊奇，觉得太离谱了……我与李成芳同志是老战友，战争年代曾在同一战区的不同部队工作，彼此是了解的。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有人居然把组织曾经派他参加“秋林受训”那段历史同“叛徒”这一罪名连在一起。

“秋林是位于陕西省宜川县黄河边上的一个镇子……1939年冬到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2月，国民党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我党坚决予以回击。在山西，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新军（即“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亦称“新军”）和八路军。蒋介石在中条山的几个军也采取同样的军事行动。新军在八路军的支持下……打退了阎锡山、蒋介石的进攻，并使整个晋西北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在压住蒋、阎的反动气焰后，中共中央立刻派朱德、肖劲光、王若飞同志分别到洛阳和宜川秋林镇同卫立煌、阎锡山进行谈判，同他们达成停止武装冲突、划定驻地、分区抗战的协议。阎锡山的“秋林受训”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搞的，当时，新军为了积聚力量，扩充抗日实力，取得公开合法地位，经党中央批准，曾派一部分干部到秋林受训。李成芳同志作为其中的一员，也参加了受训。这是党组织派他去的，怎么能是“叛徒”呢？

鲁瑞林认定：“造反派队伍中知道‘十一月事变’（亦称‘晋西事变’）的人，可能会有一些；至于‘秋林受训’，除了与李成芳同志资历相当又在军内外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几个人，或者同李成芳同志一起参加过这次‘受训’的人外，不会有什么人知道那段历史。造反派中的年轻人，更不可能知道，”¹

事情至此，矛盾不仅已搅动了地方上层，也搅动了军队上层。这样，军队高级将领之

¹ 见鲁瑞林著《西南三十年》。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间、地方干部之间、尤其是充当打手的两派造反群众之间，恶斗愈益不可收拾。

毛泽东不可能了解这么多细节，他的御用文革操盘手们，也不会估计到事情的严重性，（下面我们很快会看到，他们根本不了解基层情况），只认为与其他省区相比，云南条件相对好些，甚至还“希望你们在全国作出一个很好的范例。”¹，这样，毛泽东在决定亲自抓武汉这个大点的之前，敕令钦差大臣谢富治、王力到云南“就地解决问题。”。这个“中央调查组”也来了个老中青“三结合”，除谢、王，还有空军副司令余立金、贵州左派新贵李再含、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成学俞，以及北航红卫兵井岗山、尹聚平、胡慧娟和吴介之。

九，钦差大臣到昆明

通览谢、王在云南的活动和讲话，第一感觉是这个工作组很辛苦。6月27日到，7月4日离开，短短7天功夫，先后举行了12次座谈会和群众大会。军队座谈会包括两级军区、两个军、还有个别师，共开会7次，短的3小时，长的11小时半，加上会间用餐1小时，整开了12小时半（6月29日），另外在国防体育场开军人大会1次。群众两大派组织开会3次，再加上7月3日拓东体育馆的群众告别会，共12次。

谢王的具体打法可概括为：

一，所到之处，对谁都说好话，对谁都表扬为主，肯定成绩，让大家高高兴兴，诚如中国乡间俗语：“对毛驴甩鞭子不如顺毛捋”。二人不厌其烦地“代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讨好大家，说毛、林身体如何之健康，“我们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于云南的革命同志们的关怀带着来了，也带来了毛主席的问候，也带来了主席就地解决云南问题的希望。”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相信群众，相信你们创造一个自己解决问题的先例。这几天看来是有条件的。”“主要是听同志们的意见。”“来学习”，谢副治特别夸奖道（对比全国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部队干部支持右派这情况，谢此话应为大实话）：“云南的条件还

¹ 1967年6月30日谢富治在昆明与“毛泽东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座谈时如是说：“主席认为云南存在着解决这个问题（指成立革委会）很好的条件。希望你们在全国作出一个很好的范例。”见《凤展红旗》编印《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

是比较好的，特别在昆明来讲，左派占优势。就犯的错误来讲，也就是支持了这个左派，没有支持那个左派，或支持那个左派不够。现在有别的地方，军队犯的错误比这个严重，他就是完全支持了正正当当的保守派，打击了造反派，压制了造反派，取消了造反派。野战军也在帮忙，好多个省都是这样子的。他就是完全扶持保守派，把造反派取消，把人抓起来。而且发生大规模武斗。反夺权，这个问题比较麻烦。云南根本不是这个问题，你们昆明也不是，无非就是这个造反派多支持了，那个造反派少支持了，或不支持。”“所以，现在云南的条件比较好，军队也比较多，犯的错误（虽然）也很严重……但是，这些错误总的是在这种范围里面，还走得很近，就回来了……所以就要趁早解决。”¹

二，正式将批判靶子竖起来，让双方把矛头一致对准靶子开枪，大家彼此消气。王力在6月29日的座谈会一再强调：“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坏家伙暴露出来了，根据苏联的教训，必须发动群众打倒他们，另一方面革命派过去受排挤、受打击，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受压制打击的革命小将、中将、老将解放出来。如果不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就要被这些人打倒，被关进监狱里去，被整黑材料打成反革命，被杀头。同志们，我们要有鲜明的爱和憎，因此，凡是反对刘、邓、陶、李、阎的，就要保护他们，谁伤害他们都不允许，一定要有鲜明的爱和憎。这次我们工作团，毛主席说一定要组织小将参加，不管做什么事都要体现这个方针，凡是反对刘、邓、陶、李、闫的，揭发他们的人，要重用。”谢、王离开昆明第三天，7月6日，中央文革小组正式致电云南省军管会，称“同意在《云南日报》公开点名批判阎红彦”，反正该闫已作古，死老虎一只，爱怎么打怎么打，决不会伤和气。

三、谁都明白云南的问题是两级军区、以及军区内部的矛盾，谢王对此心知肚明，故而安抚群众的同时，把着力点放在军队。12次会议军队占了9次。谢苦口婆心说：“我希望今天在座的两个军区、两个军、空军、铁道兵、炮兵、三十七师的同志们，大家都要为解决云南问题作出贡献，作出努力。不管过去有多少错误，多少缺点，多少问题，都要

¹ 谢富治、王力在昆期间，有文字记录的讲话共12次，以下所引均出自这些讲话记录。

为当前毛主席交给我们的重大任务，就地解决云南问题作出贡献。”云云。

可惜，面对已经失控的群体情绪和极端病态的个人、帮派利益，谢王过高估计了北京的权威，满以为打出毛泽东和中央的令牌、说几句安抚溢美之词，就可让造反派乖乖俯首从命。实际情况是：首先，运动发展至今，每个人的政治身份都以明确的派别所表征，所谓“派性”，已不仅代表“荣誉”或“偏见”，而是实实在在政治前途、甚至身家性命，他们必须为此以死相搏；其次，群众组织对于政治实用主义已了然于心，对“最高指示”早已懂得断章取义，各取所需，或者“打着红旗反红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第三，这种派斗很像历史上的教派战争，双方都可对教义进行不同解释，以作为自己的理论旗帜。文化大革命的派斗则更麻烦，因为教主还活者，据说身体还非常健康，他本人说话就常常语义模糊，甚至翻云覆雨，让人无所适从，焉能将众人行为定于一尊？比如，6月29日王力在昆明军区讲话，反复告诫，说根据毛泽东指示提出“拥军爱民的口号，这在全国形势是一个转折”“拥军爱民是在新形势下的战略口号”“这不是一般的口号，是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的口号”指责“红卫兵小将没有看到形势变化，所以还扭住什么‘赵永夫’‘谭式人物’‘带枪的刘邓路线’”等等，可具有讽刺意味的偏偏是，就在王力大谈拥军爱民之后一个月，“720 武汉事变”惹得天子一怒，8月1日《红旗》杂志社论就公开地、大张旗鼓地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掀起全国性的反军乱军高潮；又不足一月，毛泽东便大呼：“还我长城”，将“反军干将”王力揪了出来。教主尚且如此朝三暮四，谢、王的昆明言论自然更难逃被不同解读的命运。相同的命题一经作出不同解读，立即成为两方派斗的利器。最后，尤其糟糕的是，他们的讲话（包括相关高级军头的讲话，且不论在什么环境的讲话），马上就会捅到社会上让两派百姓使用并立马加以过度渲染。如：谢王召集军区党委开会，李成芳、陈康、张力雄等各敏感军头均作自我批评，李成芳把“主要的责任他都担负起来了。”谢富治说“那个会议开得很好”，第二天满昆明“就出了传单，就把那个会议的内容传开了，本来那个会议是很好的气氛，可是一出来就糟了。”“你去一传

达，明天又不知出几张什么大字报，又是说某人讲的几点，各取所需，简直是毫无根据的，你没有那回事，他都可以给你贴几条。如果你讲十多二十分钟，他就可以给你贴十来八条，简直多得很多的”¹又如，6月29日谢、王第一次主持召开两级军区党委联席会议。谢在会上明确指出李成芳的错误是支左工作中的错误，不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二天，满城大字报大标语就宣布了：“两级军区的问题主要是昆明军区的问题，昆明军区的问题主要是第一书记的问题。”于是狂呼：“打倒李成芳”“李成芳是大叛徒”；再如干部问题。谢富治称：“毛主席再三说凡是站到革命方面反对革命的敌人的，要受到支持。那怕是躲在床底下把他拉出来，他要革命就要他，革两年就不革了也要。这样的话我们听毛主席说过五、六次了”所谓“床底下拉出来”，系指辛亥武昌起义成功次日，群龙无首的革命党人从床底下将满清鄂督黎元洪拉出来就任统领的典故。此典大可看出毛泽东为早日圆革委会之梦，急于“解放”被他教唆造反派“烧烤”过的老干部之心切，于是，曾经被军管会宣布取消的“中上层干部联络站”的“走资派”派们马上如打鸡血，迅速东山再起，成立一个全国绝无仅有、跨地区、跨行业的、人数上万的干部组织“毛泽东主义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战斗兵团（简称《摧资兵团》），高调介入一派群众组织的活动，把云南文革搅得天翻地覆——此题将在下面设专章介绍。至于要众人“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排除一切干扰，开展革命大批判”“进行革命的教育，特别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进行仇恨刘、邓、陶、李、闫的教育”，则更不灵了。有人干脆说“阎红彦是死老虎”谁都可以拿这张虎皮做幌子，干自己的私活，不提。

最让钦差大臣感觉晦气的，是7月1日建党节，驻昆部队干部和军队院校文体单位人员在国防体育场举行大会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军校亲“八”的“红总”派整队进入会场，先期到达的亲“炮”的“革联”“联指”派²无视钦差大臣在场，立即摇旗呐喊挑衅，并趁乱拥上，强占主席台两侧事先安排“红总”的位置，大会混战顿起。“红”派蜂拥上

¹ 谢富治7月2日讲话

² 昆明军校有三所，分别是军医校、步兵校和军外语学校。三校的八派都带“红”字，炮派都戴“联”字

前插旗卡位，旋又被“联”派拔掉，幸而“红”派知趣，最后离场而去，避免了一场全武行大戏，使大会得以正常进行。目睹闹剧的谢富治在次日昆明部队干部座谈会会有点控制不住情绪了，如此呵斥道：“我现在看到军队机关还有点问题，我还有点关心，不大那么稳定。昨天开会那个会，给我的印象是很不好的，很不好的！啊呀，我看冲会简直有点生气，这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地方是西南国防重地，军队不能没有纪律，军队不能是无政府主义的……有意见可以提，但你不能这样搞，不能这样搞，大家要重视，把军队稳定下来。国防这件事情中央都很关心，这个问题关键是干部，关键的关键又是在座的干部！要带头！军队不听招呼，可麻烦呐！一个内蒙古两千多人到北京，后来没有别的办法就动用武力。”

7月4日就得离开了，中央大员对于滇人不听招呼，胡搞一套，显然已有点不耐烦。在7月2日的讲话中，谢富治干脆这样赌气：

“凡是左派占了优势的，不要军管。只有那个地方是几派对立，又是关系国计民生，天天打架，生产根本不能维持，要去管它几天，除了这些地方，你都不要管。那个不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地方，天天在打架，你让他去打嘛！他反正又不生产大炮，又不生产机关枪，又不生产大米，又不生产什么，他高兴去乱你就让他乱嘛！那有什么坏处？何必要去军管呢！”

生产大米的当然只有农村，至于昆明城，本非军工基地，能有几个地方生产机关枪、大炮？只要不生产机关枪、大炮就可以乱，这不扯淡吗。

再听谢富治的离别赠言，真有点黯然神伤了：“我们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于云南的革命同志们的关怀带着来了，也带来了毛主席的问候，也带来了主席就地解决云南问题的希望。我们对他们两派讲了，我们要马上返回北京。你们对主席的关怀、问候，对主席的交待，云南问题就地解决，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如果我们回到北京，我们要是空手而回，这也好像是不好汇报的，是不是要有点成果？”¹

¹ 同注释 101

临行，总的硬着头皮笑着脸向广大老百姓表示表示，于是7月3日晚，谢富治、王力在昆明东风体育馆主持召集两派群众组织团队长开了大会。没承想，这个礼节性的告别会，还是为钦差大臣云南之行失败的旋律末尾，平添一堆令人沮丧的音符。

东风体育馆是1959年建国10周年，模仿北京格调修建的昆明“十大献礼建筑”之一。可容观众3000人，可那天至少涌进8000多，馆外被围得水泄不通。为避免冲突，执勤部队由北向南五路纵队坐于地板上，把场馆分隔为东西两大块。八派由东门进，坐东边，炮派由西门进，坐西边。馆南大门紧闭，北面主席台则端坐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再含及军区一千领导。中央大员讲话初时，东西两边掌声差不多，口号基本一致，无非是“坚决拥护中央文革”之类。待到王力讲话了，东边掌声渐渐稀落，西边掌声则愈见热烈，激越出彩之段是某炮派代表递上字条问：“4·26火炬游行是不是革命行动？”王力答：“有那么多造反派组织、有那么多革命群众参加，而且批斗了走资派，当然是革命行动。至于火炬游行的方法是否恰当，以后值得总结。”西边顿时爆发出长时间暴风雨般的掌声，东边亦随之高呼口号反击，会场紧张气氛推向高潮。此时，正好有炮派宣传车开到场外助阵，高音喇叭呼叫：“改组云南省军管会”“打倒大叛徒李成芳”……八派与会的团队长们愤懑难忍，大会刚一结束，便潮水般涌出会场将宣传车砸了。

十、《八八批示》

下面这个假设对于讨论云南文革历史是有意义的：

“如果”没有1967年夏谢富治、王力的昆明之行，云南文革会好些？还是糟些？结论很清楚，按照文革本身的政治逻辑，不管二人是否来滇，形势注定都会更糟，但是，我们很快又会看到，他们的到来确实让云南形势恶化的速度大大加了速。这有点像自然丛林里的生存竞争，一旦引入人工干预，常常会使事情变得更加畸形与失序，这些人为干预因素，包括个人的爱恶、历史恩怨和政治关联，等等。

昆明军区的领导干部多出自山西新军决死1纵队，一部分是红军干部，由中共派往山

西者，另一部分是山西、河北参加新军的进步青年（如昆明军区副政委王砚泉、副政委胡荣贵、张子明、政治部主任雷起云，及13军军长吴效闵、14军军长梁中玉等，均属后者），还有出自红四方面军者，如司令员秦基伟、政委李成芳、副司令查玉升、陈康、田维阳、鲁瑞林、云南省军区司令黎锡福、副司令张力雄¹等，由于老乡感情、政治履历、军队山头甚至个人恩怨等因素交织，昆明军区领导干部多偏于八派观点，云南军区多偏炮派观点²，他们利用昆明军区司、政、后三大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简称‘无革派’）”（一般干部，属多数派）大打秦基伟、李成芳、胡荣贵、张子明等，云南军区张力雄及各下属军分区多支持炮派观点，于是大打黎锡福。昆明军区中陈康“一枝独炮”，在军区党委会明确表态支持群众揭发批判“大叛徒”薄一波在云南的死党，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³，于是大得炮派拥护。

自1947年7月中共组建中原野战军始，陈康即为陈（赓）谢（富治）兵团4纵13旅旅长，在“豫西牵牛”战斗中大得陈赓、谢富治赏识。陈康与小自己18岁的山西美女郭青⁴结为如花美眷，就是谢富治从中牵线，虽系民间言传，却有相当可信度⁵；还有，据吴东峰先生“公安部长谢富治上将害人太多临终忏悔”一文称：据陈康介绍，说“谢富治临终前，陈康将军曾到北京看望他。是时谢富治尚认人，见老党员尤激动，口中喃喃言：‘xxx

¹ 其中田维扬、鲁瑞林、张力雄系由红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合并时转来。

² 1955年军队第一次授衔，张力雄系正军级干部中唯一两个低授位大校的军官之一。对此，据说他多有怨气，似可理解。

³ 见《军工战报》1967年12月23日文章《从何肃起》

⁴ 郭青1940年参加革命，时为13旅机要员。或曰，无需谁牵线，旅长要与之结婚也是情理中事

⁵ 据从小在成都军区大院长大的文革研究者陈永迪致信笔者介绍：“我母亲是军区门诊部的妇产科医生，经常有官太太来我家咨询生孩子的事，闲谈时聊的最多的话题是周围干部的婚姻大事，常听他（她）们说组织上给某某人介绍了什么什么老婆，某某人不服从要受处分。57年反右时，批判我家的邻居眼科主任向医生，说他没有组织观念，自己找的老婆组织不批准，组织介绍的他又不要，这不是反了吗？在部队里（地方上科级以上干部）结婚是要组织批准的，谈恋爱时就要打报告，组织要审查对象的家庭出身、本人历史、政治表现等等，严苛程度不亚于入党审查。这套组织介绍老婆的规则源于战争年代。军队长期在山沟打游击，没条件解决婚姻大事，为了既不影响打仗，又要解决干部的急需，在延安时作了一条“二八五七团”规定，即年满二十八岁，五年党龄，七将军龄，团级及以上干部；若是地方、机关党员干部，则要求年满二十八岁，五年党龄，县级、科级及以上干部。全部达到上述条件，党组织方允许其结婚。介绍老婆也成为上级笼络下级的手段，有权势的上级介绍老婆你敢不要？感谢还来不及呐。所以，说秦基伟老婆是贺龙介绍、陈康的老婆是谢富治介绍不会有误，部队里层层介绍老婆就像现在朋友间介绍“好股票”一样。

不是我要整的。xxx 不是我要整的，都是啊啊……’陈康告别时，谢紧握其手，反复曰：

‘我在云南没干坏事啊，我在云南没干坏事啊！’”¹谢离世为1972年，正是风头正足时，对老部下出如此忏悔之语，足见谢、陈二人关系之善。钦差大臣王力更特别，原来偏为赵健民的老部下，解放战争时赵任十七军军长，王力任麾下之政治部主任，二人关系之深更不必说了。

代表中央前来“就地解决问题”的钦差大臣，与炮派军、地后台既然明摆有瓜田李下之嫌，本该避一避的，但他们偏偏不避或避不了。同为调查组成员的李再含，1967年12月12日接见823战报记者时明确透露说：“毛主席对各省主要成员哪个站出来很关心，四川要李大章站出来，赵健民不是主席直接讲的，是中央文革的意图。……这样，谢副总理到云南直接找赵健民谈话。”²如论干部份量，当时云南明摆还放着一个重于赵健民、却为八派保护的周兴，谢、王为何不去谈话？感情亲疏之别萃然于众了。在两派已经严重对立的情况下，如此作派只会挑起更大的混乱了。鲁瑞林的回忆可以代表这种情绪：

谢富治等人到昆明后，一下飞机，就先与云南两大造反派中的一派直接接触，找人谈话。军区党委和省军管会却接触不到他们。相反，在军队召开的一次大会上，谢富治借军队院校两派的场地之争，当众对李成芳同志大发脾气，制造难堪，使李成芳同志下不来台。他们讲话中还影射李成芳同志“不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无权指挥代表着无产阶级利益的部队”。后来，谢富治等在昆明体育馆接见昆明地区造反派代表时，讲了许多话，却连一句支持省军管会工作的话都没有讲，反而口口声声强调“云南的问题，交给云南群众解决”。

谢称“云南问题要交给云南群众解决”，其实心中已有腹稿。谢王一行到成都，即刻要求昆明军区党委提出一份解决云南问题的“建议报告”，特别指出要给省军管会增补两名副主任，还要求把增补的具体人选写进，报告写好后派一名军区领导人专送成都。

¹ 《同舟共进》2014年第11期

² （《政法战报》1967.12.19）

鲁瑞林这样记录昆明军区当时的困境：

这个“建议报告”怎么写？军区党委感到不了解谢的意图，不好写，但又必须写。党委讨论决定，以有利于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交给的军管任务，有利于军区机关部队的稳定，有利于边境的安定，有利于稳住全省大局，促进工农业生产，保障援外任务的完成成为立足点，来提建议写报告，并把党委经过慎重考虑，全面衡量，反复研究后提出的增补两名省军管会副主任的建议人选，也写了进去。报告定稿后，党委决定让军区一位副政委王砚泉亲自送到成都去，当面向谢汇报军区党委讨论报告的情况。

王砚泉将军，河北新镇县人，人称文武双全“儒将”，亦被人称为“米高扬式的投机人物”，足见其行事之周全圆滑，派他办理此事实是在再合适不过了。王赴成都将昆明军区党委的建议报告呈谢富治，谢尚未看完便冷冷道：“这个报告不行，要重写！”但如何写法却不提具体意见。王将军只得心中暗自揣摸谢的真实意图。

中国官场办事历来只需对上司负责，忖度上意乃为官第一基本功。上司（无论贵为天子或微如芝麻小吏）既想捞取功利官声，又怕担失误之责，行事总得拉下级垫背，事情遂愿功成，自属其德政；事情不遂失败，板子打去下级的屁股可也。下面还有精彩案例可佐，不提。

还说王将军独困成都，绞尽脑汁，终于悟得问题要害就在需增补两位副主任的人选上：昆明军区党委提出的人选，均不中谢富治心意，于是从成都给军区打回电话请示。

（王砚泉）对谢富治要求重写的真正意思，似乎心里清楚，但又不便直说，便含蓄地说，据他的理解，关键是不是在人选问题上？这一说，李成芳同志终于明白了，他立即召开常委会，再次讨论建议报告。常委们对此理所当然地表示了不同看法，有的常委同志说：原来的报告把问题都说清了，具体人选也写上了，如果上面认为哪个不行，就换掉，哪个行，就添上，我们还怎么讨论？尽管话这么说，常委们在李成芳同志的主持下，还是再次讨论了建议报告。在当时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常

委们违心地改变了原来提出的人选对象。这次讨论的情况和更换的人选，从电话上传过去以后，谢再没有表示不满意。¹

7月12日，按谢富治旨意修改后的报告《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建议报告》，以昆明军区党委的名义，正式上报中央。约一月后的8月8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7）237号”文正式发布称：

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

中央同意你们七月十二日提出的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也同意增补陈康、张力雄同志为云南省军管会副主任。

这个颁布于1967年8月8日的中央文件文件，被云南人简称为“八八批示”。它对云南文革进程的影响显而易见、甚至是致命的。批示的附件，即所谓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这个压力下形成的意见，除了增补“支炮”的陈康、张力雄为军管会副主任（第四条），还有一条非常要命：

原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同志，站出来揭发和批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坚决支持。（第五条）

这个第四条和第五条，俨然北京送给云南炮派的两个大礼包。

就在八八批示颁布月之初的8月1日，《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的文章。该文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是当前的大方向。”由是，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此“反军狂潮”之狂，以至于事情不足一月，急得毛泽东不得不立马刹车，并于8月26日将鼓吹者王力和关锋抓了起来。——八月初肆虐全国的反军狂潮，成了北京送给云南炮兵团的第三个大礼包。

¹ 鲁瑞林著《西南三十年》

包。

效果很快显现：云南省军区司令员黎锡福离开了军管会领导岗位，另一副主任张子明按“五·三〇”中央来电精神，接受历史问题审查，也离开了军管会，军管会主任李成芳虽未被免，亦在一片“肃薄（一波）肃李”“李成芳是大叛徒”的喧嚣声中黯然离去，到北京暂作寓公。军内外的实际负责人，成了履新的军管会副主任陈康。云南的政治天平，整个儿倾向了炮派。

还有，除了军管会领导班子彻底公开翻盘，还有因赵健民“造反”被高调肯定而搅起的另一股巨大力量：官僚集团很快被动员起来，1月初成立3月初解散的“干联站”，现在重新吹响了集结号。

作为花絮，笔者应该补充一个与“八八批示”第五条有关的精彩案例了：该“批示”发布不过半年后的1968年1月21日，中央接见云南大员，康生正式宣布赵健民为叛徒并实施监禁，同时还专门义正辞严地宣布：

要澄清一个问题。上次有人讲支持赵健民是毛主席批准的，完全没有这回事。那是昆明军区有个报告，对解决云南问题提了些意见，中央批那个报告。¹

十一，“八四大会”和“摧资兵团”

西谚有云：上帝要让人灭亡，必先让他疯狂。如果用这句话来表述中国的文革逻辑，则还当补充一句：若要让人疯狂，必先让他膨胀——让被毁灭者虚幻的政治获得感极度膨胀。

1967年的云南炮派群众，及与之结盟的官僚集团，尤其这个集团的领袖人物赵健民，接二连三收到来自北京的政治大礼包，虚荣心和成就感终于让他们难以自制，必然要马上出手行动并走向疯狂，同时，冥冥之中又必然为自己酝酿着巨大的灾难。

¹1968年1月21日康生谢富治接见昆明军区和云南群众代表时的讲话

由老干部们公开发表声明成立“毛泽东主义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战斗兵团（简称《摧资兵团》）”公开成立于1967年8月25日，而实际上，在8月4日，即八八批示正式下达前4天就开始活动了。如果再说早一点，成立于1月5日的短命的“干联站”正是该组织的预演，难怪许多云南文革亲历者和研究者，常常要误将“干联站”和“摧资兵团”当作一回事。

从王砚泉去成都呈送报告到7月12日正式成稿，再到8月8日北京正式批示，其间所有内部的微妙故事，注定都不可能有任何秘密，因此离“八八批示”下达尚有4天时间，炮派便迫不及待召开了约5000人参加的干部亮相大会。他们显然得知了中央文件里关于陈康主政和支持赵健民的消息。

云南大学炮兵团的喉舌《九一四战报》第28号兴高采烈地报道了这个大会。消息的题目是：

全省革命干部揭发控诉刘邓陶李闫大会取得辉煌胜利

副题是：

许多革命干部纷纷表示，坚决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向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猛烈开火

消息报道，会场设在“壮丽的昆明东风体育馆”。大会“8月4日开幕，历时4天半。于8月8日上午胜利闭幕”。“冲破重重障碍、从刘邓反动路线的枷锁下英勇拼杀出来的我省工交、财贸、农水、党群等16个大口4000多名中上层干部胜利地同革命小将汇聚在一起了。他们中有的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从各专州奔赴来参加大会的。”

云大炮团领袖方向东就“目前国内外形势及昆明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和“干部问题”两个主题作了热情洋溢的长篇讲话，他承认“我们从去年11月（1966年11月）就开始做干部工作了，后来成立了云南省中上层干部联络站。干部联络站对干部站出来亮相起了很大的促进

作用，对于起部来造反有很大鼓励……但是干部联络站……遇到了阻力，被打成‘黑司令部’‘炮兵团的黑后台’”这个口无遮拦的学生司令武断地下结论，说“刘林元同志”是被“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下狠心迫害革命干部”“下毒手，杀害了。”他声言：“我们吸取了刘林元同志牺牲的教训，对赵健民等同志采取了保护措施。”这个青涩而耿直的彝族小伙子，直截了当地向老干部们表白心迹：“我们炮兵团为什么组织不健全？几个造反派头头，都是些冲锋陷阵的，经验少，头上没有‘皱纹’，没有‘摇鹅毛扇’的人。如果多有几个无产阶级干部站出来，给我们‘摇鹅毛扇’，我们这个队伍会组织得更好”“现在我们不会做‘官’，所有这个队伍没有组织好，怎么采取有利的斗争策略啊？如果多有几个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干部站出来给我们‘摇鹅毛扇’，我们这个队伍就会组织得很好的。”他激情万分地欢迎：“在座的不要怕，这次中央首长来（指谢富治、王力等）大大地撑了我们的腰，你们不要怕当我们的‘黑后台、黑司令’，你们当我们的后台、司令（笔者按，注意：方不仅要他们作后台，还可以当司令），是你们的光荣。”完全可以确认，方司令这一堆大实话，定然让在座头上有“皱纹”的老江湖们一个个心里暖洋洋的。

接着是干部代表大会和“5个大组、几十个小组进行充分热烈的讨论。高度赞扬革命小将千方百计给干部‘亮相’和串联提供了有利条件等做法。”“李成芳、陈康、省军区政委张力雄、昆明军区副参谋长王非、空指赵斌同志来到会场，陈康、张力雄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们的讲话“不断被热烈的掌声打断”。陈康、张力雄和王非都以支炮闻名，而李成芳出席会议则不过虚应故事罢了。因为想必他已知道，自己很快就要调离昆明。《九一四战报》只说了一句：“李成芳也在大会上发了言，说他对大会表示坚决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消息还作了如下介绍：大会“首先发言的是郭青、赵健民和林亮”。“还有省委党校“革命大批判联络站”宿式平等13位同志，商业厅候良辅、省委办公厅鲁崇敏、省财政厅“齐声唤”易国英、省委机关联合兵团组织部“逐浪高”“急风暴雨”“红到底”省委宣传部毛泽东思想“普通一兵”周毅群、省公安厅阎罗等，以及从呈贡和开远解放军化肥厂赶来的革命干部。”。赵、林、郭三人都是支炮的铁杆大佬，赵为省委

书记，林为轻工厅长，郭不过滇南一化肥厂驻昆办的主任，但消息把她放第一位，而且用700多字对其发言做了摘登，其余干部发言均未见报。将郭青分量如此看重，傻瓜都懂：郭女士本人正是军管会新科副主任（实际主任）的夫人。还有，郭女士生得体面，有些革命资历¹，而且敢作敢为，绝对可以替老公当半个家。正因为性格过于张扬，以至于一贯儒雅的周恩来在一次接见云南代表，对她的过多插嘴实在看不下，当着众人严肃地呵斥道：“我还不知道，要你来教训我？陈康叫你牵着鼻子走，我不能让你牵着鼻子走。”康生跟着训斥：“要谦虚一点。你大概是教训人惯了，教训起我们来了？”“这是在中央开会，党、政、军队都在一起，谦虚一点，老实一点，”²

1967年8月4日注定是炮派和云南官僚集团的盛大节日。在“本报略有删节”的方向东主旨讲话“干部问题”5400字记录稿，就有“鼓掌”4次，“热烈鼓掌”9次，还有1次“长时间热烈鼓掌”，平素被人戏称为“草包司令”的方同学，今天俨然成了党中央代理人，他关于“摇鹅毛扇”的邀请，特别是传达关于毛泽东毛主席再三说“凡是站到革命方面反对革命的敌人的，要受到支持，哪怕是躲在床底下，把他拉出来，也要他革命，革两年就不革了，也要。”“你们当我们的后台、司令，是你们的光荣。”，简直有古圣王礼贤下士的谦恭与真诚，使全场的老干部们真正感觉噩梦已经结束，属于他们的时代重新开始了。于是，半月后，他们的组织正式挂牌成立。曾经短命的“干联站”华丽嬗变，成为规模更大、人数更多的《毛泽东主义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摧毁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战斗兵团》（简称“摧资兵团”），直接成为炮派的智囊与核心。

笔者查阅了全国多地文革史料，遭受迫害或不公正待遇的老干部趁文革大乱之机，为改变命运上京告状者有之，私下串联者有之，小规模聚会者有之，但一经发现，均难逃“非组织活动”的厄运。文革后期，四川曾兴师动众追查“三老会”（据说是一个“老红军、老干部和老地下党员”的“非法组织”），说是“串联几百个‘老反革命’搞翻案。”，

¹ 郭青40年参加革命，46年入党，曾在抗大11分校学习，后在陈康所在陈谢兵团13旅任机要员。1955年授上尉衔。

²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首长接见昆明部队赴京开会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1968年3月15日中央解决四川问题，江青在讲话中干脆宣布：“‘三老会’反动得很，要坚决镇压。组织要解散，核心成员一定要专政。”该案株连干部和群众达十万之众，直到1984年7月，四川省委才发了个[1984]5号文件《关于为所谓“三老会”组织平反的通知》，追查16年，证明该组织纯属子虚乌有¹。云南“摧资兵团”这样公开的、干部抱团以捍卫自己权益的组织，在全国可说是绝无仅有的文革奇葩。难怪“四人帮”倒台后，云南“揭批查”的16个冤假错案，“中上层干部联络站”和“摧资兵团”赫然名列第三和第四。

《摧资兵团》正式发表的成立声明如下：

毛泽东主义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战斗兵团（《摧资兵团》）
申明（1967年8月25日）

战鼓频摧，军号嘹亮。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新动员令，一场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打响了！两个阶级、

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大决战进入关键时刻！

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战，云南革命人民揪出了中国赫鲁晓夫的干将阎红彦，阎王殿已被打的七零八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到处呈现一派大好革命形势。

正当这个时候，党中央毛主席对云南文化大革命“八·八”指示下达了。这个光辉的文件照亮了我省文化大革命继续前进的道路。

但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甘心失败，为了挽救他们垂亡的统治，采取各种卑鄙险恶的手法，向革命造反派进行猖狂反扑。以李成芳、周兴为首

¹ 参见陆安桥“文革”四川“三老会”案真相（载《文革纵横》）、李亚宁：“文革”中我亲历的四川“三老会”案的真相（往事如殇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xhj58>）

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组成了新的反革命防线正猖狂地对抗毛主席，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他们挑动武斗，屠杀革命造反派，妄图扼杀云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这样的一个决定云南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关头，我们昆明地区省、市级干部，成立了“派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战斗兵团”。为了保卫伟大统帅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彻底摧毁云南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坚决和红卫兵革命小将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高举“造反有理”的革命大旗，与党内一小撮凶恶敌人决一死战，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庄严宣告：

1、我们一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对准刘、邓、陶、李、阎及其在云南的死党，不仅从组织上把他们打倒，而且还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批深，批透，批臭。不论他们伪装得如何隐蔽，如何巧妙，也不管他们采取多么阴险毒辣的反扑手段，我们一定要坚决，干净，彻底，全部把他们消灭掉；

2、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彻底批判和肃清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团结所有革命的干部。只要不是三反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都要欢迎他们立功赎罪，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集中火力，打倒闫、周（兴）、孙（孙雨亭）一小撮死党，夺取全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3、我们深知斗争道路是曲折的，必然会遇到许多艰难险阻我们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时时刻刻以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加强我们队伍的思想性、组织性、科学性。提高革命警惕性，从政治上，组织上加强革命队伍的团结，到群众中去和红卫兵小将革命造反派一道为彻底摧毁刘、邓在云南的黑司令部，为建设一个毛泽东思想照耀的红彤彤的新云南而奋斗。

打倒刘、邓、陶、李、闫！（以下十条标语略）

《摧资兵团》的“组织章程”如下：

1、本兵团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紧掌握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陶、李、阎及其在云南的死党阎、周、孙黑帮，不仅从组织上把他们打倒，而且还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誓死捍卫伟大统帅毛主席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支持革命干部站出来造反，团结干部大多数，坚决支持革命干部赵健民同志，坚决拥护中央和军委任命陈康，张力雄同志为军管会副主任。

2、凡参加我兵团的战士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遵循林彪副主席的教导；既要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对象，又要自己当成一分革命力量，参加革命斗争，并在斗争中改造自己。

2. 认真并坚决贯彻执行本兵团的声明和组织章程。

3. 只要不是三反分子而坚持不改的干部都可申请参加。

3、参加手续：

1. 本人申请。

2. 经团队批准。

4、各单位战斗兵团、队组织，需经兵团团支部批准。

仅看两个文档，就知道这是一个管理规范、组织有序的机构。官方史料记载：“成员主要是云南省和昆明市两级机关部分科级以上干部以及一些厂矿、学校、企业单位的支部书记、厂长、经理；后来，一些地、州、市、县也有一部分干部参加进来，全省约有1万

人参加了这个观点倾向‘炮派’的群众组织。”¹玉溪财贸委员会副秘书长、云南地下党成员普朝柱，担任了该组织玉溪分团的团长，十几年后，成为了云南省委书记。

文革史专家杨继绳先生在其专著《天地翻覆》中，将文革定义为毛泽东、官僚集团和造反派三方的角力游戏，那么在云南，这个角力游戏则呈现了一种特殊现象：八二三作为造反派，偏偏政治性格温和，讲究政策，尤其拥军；炮兵团也是造反派（虽然内部多些运动初期的老保，本质上来说也属于造反派），在“揪军内一小撮”问题上却表现得尤其激进。这样，在三角游戏中，炮兵团和官僚集团抱团成一方，而823却和军队结盟为另一方，形成了特殊的三角五方游戏。

十二、力量的重组和转移

“84大会”上，方向东说炮兵团和八二三相比，“组织不健全”“经验少”，确是一句大实话。炮派领导核心一直涣散。即使在炮派基本盘云南大学，方向东（物理系）为首的炮兵团和周继文（中文系）为首的《共宣》就互不买账，物理系这位姓方的“大炮筒”干脆就被人蔑称为“方老草（包）”。823则完全不同，以智商过人、思维缜密、行事稳健的研究生黄兆琪领衔，加上颇具组织能力和行动能力的刘殷农、及敢冲敢闯的建筑工人领袖杨树先三人组成的领导团队，一直非常稳定。如今一旦干部掺和进炮派、而且以集团力量掺和进来，情况就大不同了。

和“摧资兵团”这些混迹政坛的老江湖想比，无论政治敏感、赌注判断还是斗争谋略，823领袖（当然也包括炮派的领袖）们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群众领袖看似叱咤风云，其实不过在政治幼儿园里跟着北京的口哨蹒跚学步罢了。难怪“揭、批、查”运动中被判“现行反革命”罪的823大佬、曾以知识分子代表名份当过“九大”代表的沈炳章，投入大牢后被同囚一室的冯庆波嘲笑，说“你们算什么造反派？根本就是‘紧跟派’”²。冯是

¹ 云南省委党史办《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纪实》第176页。

² 沈炳章回忆录《蒙难林家院》（自印本）。

炮派著名的武斗之花，工人出身，以至于炮派内部都觉他匪气过重，暗中想以土匪之名将其除掉；沈炳章出狱后流浪东南亚，遇到原昆明医学院炮派学生、后成为泰王室“御医”的李国栋，李对书生气十足的他也说同样的话。李国栋曾是炮派的御用笔杆——我们下面很快会说到他——文革后大彻大悟。

古罗马斯多葛主义哲学家塞涅卡说过：权势“使人成为一个有能力的兽类。”¹。混迹官场，权力生涯早让老干部们学会了政治丛林的生存技巧和捕食方式。有这些“黑手”来“摇鹅毛扇”，炮派领导机构首先被有效进行改组。医学院炮派学生领袖赵璋介绍：“8月15日左右，张力雄等同志便在云南军区召开了炮派负责会议，由张力雄请来了高仰义作报告统一思想，还说炮派右倾，并宣布了由李毅、沈昌雄等一两个人决定的常委核心名单，根据张的意见。‘整顿’了炮派的核心领导。”²

李毅，昆明医学院学生，滇北山区昭通人。生于教师之家。与聪敏过人的江南秀士黄兆琪相比，李更像不善言辞的小城痴汉，只是近视眼镜片后面让人捉摸不定的眼神，透出几许善工心计的深沉。在需要鼓动家和莽撞汉的动乱年代，李毅的形象和地位于炮派内部，远在性格张扬的方向东之下。其地位的突然蹿升，皆因为一个颇具戏剧性的偶然事件：

谢、王离昆后的7月13日，省军管会召集两派常委谈判制止武斗问题。谈判正进行时，数十名八派工人突然抬着“伤员”冲进会场：原来两天前，昆明机床厂“11·8”团到昆明参加拥军爱民联欢会，回厂途中遭“5·1”兵团（炮派）几百人半路拦截，打伤40余人，“11·8”抬伤队伍与谈判会不期而遇，会场顿时群唇乱舌，一片喧嚣。炮派代表正是昆医炮头李毅和云大炮头周律型，二人理所当然宣称八派破坏协议、首先动手而又贼喊捉贼之类。八头黄兆琪厉声断喝，大呼斥责，道：“李毅！周律型！你们两位说话可得有根据，不能信口开河！”

¹（美）威尔·杜兰特《凯撒与基督》第392页。

² 赵璋文“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春城风暴》1968年2月20日，第三版。

寻事的八派工人听黄兆琪大呼李毅、周律型姓名，登时一拥而上，专打二人泄愤。据说，李、周二人均被打为重伤，李毅脑震荡，当场昏倒在地，谈判终止。斗殴事件发生后，李毅被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熊奎接到家中疗伤，周律型则被接至省军区政委张力雄家。资料介绍：学生炮头在首长家养病期间，始终受到“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照顾”，二人对所受照顾“时常引以自豪地向常委们讲述，又由常委们向我们介绍”“以至有的常委感慨当时挨打的要是自己就太好了，也可享受如此礼遇。一些被照顾的细节还被讲得很是肉麻”¹毫无疑问，正是这种时间不短的零距离生活，使云南军区首长对炮头的好感日增，从而很快将李毅推到了炮派一号的位置。方向东反倒被渐渐边缘化了，只是在需要干具体活儿才被派上用场。正因为此，几十年后，赫赫有名的俩炮头依旧心怀芥蒂，形同陌路。同样，医学院的炮头赵璋、师范学院李湘等人后来也反了水。

八派并非没做干部工作。资料载，7月11日，八二三也召开过省委副处长以上干部大会，鼓励他们“站出来革命”，7月30日，又在东风体育馆召开了一个全市处级以上干部大会；8月8日，还召开了一个为期10多天的干部大会，邀请省、市级机关科长以上干部参加。可惜，他们偏偏缺乏赵健民这样一个敢说敢干、甚至胆大妄为的领头羊。823的后面足以和赵健民层级相当的，只有周兴这个早被共产党残酷内斗搞得谨小慎微、与世无争的喏喏循吏。再说，赵健民被刚刚发布的“八八批示”首肯，其巨大号召力，周兴与他也实在不在一个平台上了。

面对陡然出现的权力盛宴，官员内部很快进行重组，也必然发生了分化。林亮、候良辅这一干共产党的能吏干臣很快进入了炮派的核心。

林亮，原名林英亮，河南商城人。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同年加入中共。读书时即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后参与《觉报》编辑、组建“光明话剧团”并任团长，在豫东、豫中一带做救亡宣传，后，又被派国统区做秘密工作，成功策划了“信阳兵变”。1939年后，林历任新四军四师政治部秘书、淮北军区三分区组织科长、豫皖苏军区组织部副部长、

¹ 杜德威回忆录。方向东的揭发材料亦谈及此事

二野五兵团十军组织部长等职。中共大陆建政，林先后任西南军政大学八分校代政委和中共拉萨市委首任第一书记。1956年，个旧锡矿列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业项目，为加强此项建设，有司将林专调云南，任个旧市委第一书记、红河州州委第一书记。59年林亮被指犯右倾错误，文革前调任云南省轻工业厅任厅长。在工农干部绝对占优的干部丛林，凭文化水平、工作能力、执政经验，林如此出类拔萃之辈，仅仅作一区区厅长，委实有些屈才了。他需要在文革乱世重新证明自己，可谓其情其理俱存焉；其次，林亮投至赵健民麾下还有一要因：省轻工厅属下有一名唤赵森的女士，原先在贵州毕节地区做银行行长的，恰逢郭超时任贵州省委组织部长，二人遂喜结连理。官太太一般都不是省油的灯，赵森与林厅长闹矛盾自成难免之事。如今郭超已然云南“经济沙皇”、计委主任兼经委主任。赵、林矛盾自然马上通了他这个“天”。城市四清，郭直接越过省委工交书记赵建民，派工交政治部副主任李体润、组织部长陆启余前去组织斗争林亮。与事无巨细都要挽手的郭超相较，赵健民本是个马大哈，可这件事他偏偏知道了而且偏偏也要管了：盖因他本是郭的入党介绍人，如今又是郭“沙皇”顶头的工业书记。赵书记的干预让林亮大感痛快。作为报复，文革初的1966年11月三千会，“林亮专门找阎红彦去工交厅长组，听取他揭发郭超的错误，林亮对郭超的错误讲了两个多钟头，”¹。林本是一身怀才具亦儒雅有度的知识分子干部，诉苦两小时，足见其仇怨之深；还有，阎红彦死后中央召云南干部及群众代表上京，郭超在周总理面前遂大唱高调，说群众进军区本来没什么，阎红彦害怕群众，偏偏是赵健民的做法激化了矛盾。周总理深然之。赵健民由是对郭超深恶痛绝。林亮则对赵建民投桃报李，文革烽火连天，毫不犹豫站到了赵书记旗下。

再说侯良辅。侯乃山西繁峙县人，1915年生，19岁考入省立代县师范时。正值抗日救亡火炽，他与同班同学高治国、张文彬（中国石油工业部副原部长）等10人秘密组织读书会，追寻救国真理，西安事变后，得知共党薄书存（薄一波）回晋主持“牺盟会”，遂一道赴太原考入牺盟会“军政训练班”。侯良辅入十连第五班，1937年3月加入中共，并

¹ 赵建民1967年2月18日大字报《从叛党分子阎红彦等几个人罪恶事实看他们是否在云南省委中组成了反党集团》。

担任该连“民（族）先（锋队）”区队长。同年4月任“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九团八连政治指导员，后再历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一总队一大队三中队及二大队四中队政治指导员、二大队教导员、决死一纵队三十八团组织股长、政治部组织科长、二十五团政治委员、十一旅政治部主任、二野四兵团十四军四十师、政委等职。1949年2月，侯随军挥师滇西，以四十师党委书记、政委之职兼任大理军分区政委及大理地委书记，后又升任十四军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兼滇西卫戍区政委及滇西工委副书记，可谓登峰临顶矣。不料1958年6月，却突然被脱却军职，像一袋可有可无的土豆，被地方政府弄去省经委当了副职（副主任）、还兼个机械工业厅厅长、后来又弄去商业厅当厅长——读者从上述简历至少可读出两点：1.就文化水平、工作能力和从政经验看，侯良辅绝非等闲之辈，作一区区厅长实在屈才，2.侯仕途下行的拐点，是1958年被脱却了军装。坊间传说，侯之被贬下地方，全因作风不检点，多有男女关系之嫌。几十年后，此说真伪已不重要。仅看当年和他同组“读书会”同入“决死队”同下云岭之南的高治国¹，其时官运何等亨通！仅此一端，侯心里有酸溜溜的不平之感，应该是说得通的。文革突降，天下大乱，他想趁机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也是说得通的。于是，在赵健民的推荐引领之下，侯良辅很快成了炮派的核心骨干。

与林亮、侯良辅相比，一直被外界视为“干联站”和“摧资兵团”主要发起人、耿介暴烈的李清祥却很快被边缘化，性格使然，偏偏很快就反了水，到处举行记者招待会、猛揭炮派黑幕——关于这个，我们下面还要具体介绍。

李清祥这类个别的反戈并不影响炮派乘着“政治利好”高歌猛进。1967年7、8月，在江青“文攻武卫”口号的鼓动下，全国各地武斗烽烟四起。老实巴交的云南人，两派的打杀也愈演愈烈。“兄弟倪于墙，外御其侮”，武斗是弥合内部分歧的凝结剂。再说，兵者，“诡道”也，战争须在核心层秘密决策，方向东、李清祥这些“大嘴巴”、“二杆子”显然不能参与其间。用赵璋的说法，从此以后，炮派的活动都成了“蒙蔽群众，运动群众”²。

¹ 高治国的情况，参见卷一。

² 赵是医学院主要头目，1967年8月，因坚持“八二三和炮兵团目前是两个左派，再这样闹下去仍然是两个左派，我们要考虑联合”被斥责为“右倾机会主义”。见《春城风暴》第十九期。

【本刊声明】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编校：方惜辰

本期封面：邹 行